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 诸相纵论（1）

夏

刚

太初有道：“巴别”传说所示人类“语沟”及满汉融合可见的异族“语通”

“语沟”这个原创概念既仿“代沟”，又关联“文化沟”（即英语的 culture gap）。它指不同语言间的差异，类似“沟通困难·交流障碍”（communication gap）。

《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云：挪亚的后裔迁至示拿（古希伯来语，意为“吼狮之地”。即意为“河间地区”、亦称“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定居后商议建城及通天塔，上帝唯恐众人将无所不能，就变乱其口音而使彼此言语不通，遂散往各地。废城所称“巴别”意即混乱，“巴别塔”常被借喻空想的计划。该故事开导人当戒不自量力，又可解释出现诸多语言和种族。“巴别”传说是西方宗教的产物，从中国的视角看也别具趣味。其中人们对洪水灭世重演的恐惧和警惕，制砖建城、塔以扬名的行为和欲望，都不难在中华文化里发现类通。就连“巴别”或“罢伯耳”的译名，也能以汉字之妙对应内容：“别”的“另·刂（立刀）”正合上帝劈断群体；“罢”的义、形恰可表现停工、四散而去。

汉语中巧为同音的“组织”对“阻止”的攻守中，双方的利器皆为语言。《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开篇的“太初有道”，“道”即为“神语·圣言”。英文的 word（言；词）在此中文通译“道”，这个字的“道路；方向；道理；道德；说话”等语义，多层次地揭示了终极真理寓于语言。以“道”为“教”的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第1章首段举出“道·名”之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如“夕·口”的字形和同“鸣”的音，可联想黄昏中的发声。《创世记》起首的开天辟地传说，始于大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之中，运行于水上的神灵说“要有光”，又将由此分开的光和暗称为昼和夜，这头一天的从暗生明、名，也和汉字“名”的渊源隐义不谋而合。

紧接“太初有道”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联系“语”的“讠（言）·吾”组合，能悟到**时不论古今、地不分东西，人类历来极度重视语言**。这一“有道”日译通作“有言”，“有言在先”

之前导位置及作用，也现于道家祖师之教典开宗明义阐释的“道”的字形——“首·辵（走）”。不妨转借出自《论语·子路》中鲁定公与孔子对话的成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及韩愈《进学解》的“行成于思，毁于随”之说，总结古巴比伦的那场欲与天公比高的挑战是“成于言一，败于言异”。

多种语言的产生，虽给人类生活造成不便，却促成了文化多元化，激发了语言交际活动。《圣经》这部基督教经典，源头即呈“一书多语”的基因，先天就带百花齐放的种子。前一部分《旧约全书》（犹太教的《圣经》），原本用希伯来文（含部分阿拉米文〔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7世纪西亚的共通语言〕）写成；《新约全书》（基督教本身的《圣经》）原文则为希腊文。基督教从“古教”承受下来的“古经”（这两“古”是中国天主教对犹太教、《旧约全书》之称），主要的流传本就有两种语言——耶路撒冷的希伯来文本和公元前3至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希腊文译本。

为使天下人直闻神声，便铺出了无数“通天道”——此语亦借巴别塔的别称“通天塔”，指通向天道的通天之道（“天道”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有上帝意志的表现之意；日语中此意的“天道”读“てんどう / tendô”，另有“道”作清音的“てんとう / tentô”径称或敬称天神、上帝及太阳）。整部《圣经》4—5世纪被翻成拉丁文，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前后又逐渐在欧洲译作各国文字，对各国民族语文的形成及统一所起的推进作用，联系“巴别工程”的兴衰就使人想到，**世上语言似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反复。**

《圣经》在语言、文化领域创下的世界记录，是被译成2000多种语言、方言（诸说中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2000年版的2233种说¹⁾以及占全球约6900种的1/3强的约2400种说²⁾），发行总数至今不下数十亿册（逢基督教文化圈的第2个千年纪末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日文]1999年版[夏目大译，田中孝显审订，〈东京〉きこ(Kiko)书房]，令人咋舌地称1815年以来累计销售3880亿册³⁾，次年版改作还算靠谱的38亿8000万册，2001年版却缩成25亿册⁴⁾；国际圣经协会则声称仅2000年1年全球就散发、销售了6亿3300万册⁵⁾，另有史上累计发行约60亿、70亿、80亿、150亿册之说⁶⁾，总之都是天文数字）。据称印数居史上第二多的《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⁷⁾因当时7亿国民几乎人手一册而高达10多亿（另有难以置信的50亿册说⁸⁾），但中国1964—1976年发行的外文版（37种文字），及1967年10月为止各国刊行的外文译本（65种文字，853个版本），⁹⁾就有此“神坛·宝书”不如彼“神坛·宝书”的小巫见大巫之感。

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多被认为是卖春，而**第二个古老的职业（即正经行当中历史最悠久的）有说是翻译。**日本同声传译界的先驱和领军者之一的小松达也（明海大学教授），在专著《口译的英语、日语》（文艺春秋社2003年版）中援引此说，称“虽然无法确定是第一还是第二，但无疑是最古老的职业之一”。¹⁰⁾日本俄语会议口译家、作家（2006年逝世时为日本笔会常务理事）米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原万里,在新闻工作者会议上担任翻译时听会议主席说“代表新闻工作者这个人类第二古老的职业”云云,由此在随笔《同声传译的故乡何在?》(大修馆书店《语言月刊》1997年8月号)¹¹⁾中发议论,认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也许是翻译而非卖春。

其论据之一是,几乎所有的百科辞书中“卖春”条目都溯源至“神庙卖春”,即男性向神进贡物品后,共同体的女性奉献肉体作为回报;公元前490年(按:通作前447—前432)在雅典卫城建立的帕提依(意为“处女厅[宫]”)神庙的神女(日语作“巫女”[みこ/miko])就从事这一行当,而在成为其副业前她们的主业是**神与人之间的沟通**,希腊语的hermeneuties(口译员)就源自该神庙所祭祀的众神中的Hermes(赫耳墨斯)——受奥林匹斯山主神宙斯委派负责诸神和人类双方沟通者。小松亦提到译员在古希腊被视为具备Hermes的能力,指出Hermes当今以服饰品名牌著称,而希腊神话中意味着神的使者、向人解释神的语言者。¹²⁾风靡世界的奢侈品名牌Hermes(英文),源于1837年在巴黎创业的Thierry Hermès(蒂埃利·爱马仕)。日语音译“エルメス”(读Erumesu)和大中华区统一中文译名“爱马仕”,读法都近法语原音。英、法文的字面相近、发音不同,和中、日译名的用字互不相关,作为那位**宙斯之子所寓意的“语沟”**之例都有趣。

亦译“海尔梅斯”、罗马神话中称为“墨丘利”的赫耳墨斯,在那座神山(亦译“奥林波斯”)上身为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神,掌管商业、交通、畜牧、竞技、演说以至盗窃、欺诈等,传说首创字母、数学、天文学、体育,而其中**“往来·语言”的元素及“文字之母”的发明,和中国古代的“通天道”(通往天下统一之道)——“车同轨,书同文”相同**。另一值得称奇的是,“巫女”(神女)为最早的妓女之说和汉语的“神女”相通:该词源于战国楚辞赋家宋玉《神女赋序》中假托女神之事——“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后因其《高唐赋》中的“妾,巫山之女,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亦借以指妓女。雅典名庙内委身供色的“巫(神)女”和汉典名篇里甘心伺寝的“巫山之女”用字相重,**希腊神话中和宋玉笔下的交流、沟通和交媾之关联**也体现于字面。

米原接着又推翻自己的假说,因为神殿的建设必然要靠工匠等,最古老的职业还轮不到神女。但这一欲擒故纵的放弃意在提出另一命题——人类诞生后最早兴盛的职业有可能是翻译,因为如果相信《圣经·创世记》中巴别塔建设的逸闻,则人类的语言遭四分五裂后,翻译行业就会应运而生。小松对欧美翻译工作的寻根同样从该神话开始,他在承认这个寓言并非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认为有助于感受人类须超越语言差异而相互理解的宿命,以及由多种语言交织而成的世界。¹³⁾两位高手的理论探源不约而同地都引经据典搬出巴别塔,本文作者长年考察中日“语沟”的最初构思,也命名为《失题:在巴别塔的废墟上》(用日文写成的论文,载于《立命馆国际研究》6卷3号[1993年]),不妨说这一**太初之“道”(神话)在此领域有构成原点的必然**。

从“巴别塔”传说和《圣经》传世也可见**人类离不开翻译，因为国际交往须通气无异于人要呼吸**。随着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的衰落，以及19、20世纪英、美先后称霸世界，如今希伯来文早已灭绝，而英语的国际通用度稳居最高，《圣经》的各语种版本中英文也随之尤为普及。英文版里1611年问世的《英王（詹姆斯译本）钦定版〈圣经〉》极权威，1979—1982年修订为《新钦定版〈圣经〉》时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1986年访日时在国会演说的开头谑称自己从事世界上第二古老的职业（皇族），¹⁴⁾而**不论何种形态的统治者，哪怕玩弄分而治之的权术，当政时也希望便于运作而减少语言障碍**。

《三国演义》第1回的开场白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对这番历史回顾不妨指出，中国的“一统天下”始于秦朝（前221—前207）。这4字成语源自《春秋公羊传》中《成公十五年》的“王者欲一乎天下”，及《隐公元年》的“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者的时期（前722年）远早于前者（前576年），而几乎整500年后由秦始皇实现。早在东周春秋时期《礼记·中庸》就提出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成为他构筑大一统的法宝。《旧约全书》亚历山大城希腊文译本就出现于同一世纪，而其中**上帝混乱众人语言的分化破坏和“书同文”的凝集引导正相反**。

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太元年间（376—396）渔人偶进世外桃源，村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而来此绝境，遂与外人间隔而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经秦灭、楚汉争、三国乱而至东晋的约600年间，不复出的逃难者的后代与闯入者**有信息鸿沟而无语言障碍，可视为汉语“超稳定”的象征**。这一表述借鉴金观涛、刘青峰合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最早于1980年发表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上年的改革开放正式起步正值秦朝建立2200周年），推论的根据是**4000多年来汉语的基本词汇和语音、语法的基本特点被认为在世界上罕异地没有根本变化**，而在包括大量使用汉字、汉源词的日本的其它众多国度，很难想像当代人但凡具备中等以上的文化水平，就能大致看懂时隔如此遥远的母语著作。

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形成**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及文化，直到满族支配的清朝都发挥了“书同文”的软实力**。汉人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威逼下，被迫按占领者改造归属意识标志的强令剃发蓄辫，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表面屈从保住了命脉，因而国破后与山河同在的汉人及其民族文化不动声色地逆袭，结果**以汉语文和汉文化的魅力同化了异族统治者**。乾隆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35—1796年在位）喜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墨迹后，就爱以赏玩包括这3件稀世珍宝的巨制《三希堂法帖》养心息神，他对汉字文化的倾倒如同中了魔法，最终导致晚清时汉语文恢复了主体语言的地位。

按《辞海》第6版（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夏征农、陈至立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刊）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的界定，中国历代王朝中寿命最长的是汉（前 202—8 [西汉]、25—220 [东汉]，共历 27 帝，统治 406 年），其次为宋（960—1276 [北宋及南宋]，历 9 帝、317 年）、唐（618—907，历 22 帝、290 年），以下明（1368—1644，历 16 帝、277 年）、清（1636—1911，历 11 帝、276 年）几近相等。从各首、尾年份即可看出终年为虚岁而非实际年龄，而另类“水分”在于汉、宋似应打折扣：汉高祖刘邦创建的汉朝，在汉武帝刘彻治下（前 141—前 87）成为亚洲最富强的多民族国家，但从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国号新）的复古改制，到远支皇族刘秀（汉光武帝）重建汉朝之间，出现了 17 年的断裂层，两汉中较长的前汉实存 209 年，后汉王朝则如“汉”条目中的说明，在 184 年爆发的黄巾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名存实亡；赵匡胤（宋太祖）代后周称帝所建的宋朝，1126 年被金兵攻入开封而结束了北宋的历史，次年赵构（宋高宗）称帝、后建都临安（今杭州）而称的南宋，大可视作失去半壁河山而偏安一方的小朝廷。

用持续支配全国为标准衡量各朝代的“基本健全寿命”（仿“健康寿命”而强调实力、实效的原创概念），则不妨以唐和明、清为三大长寿王朝。这一论断也能当作不过 300 年必有改朝换代的周期性规律讲，而明被满族灭可反衬出前、后朝代同为汉族统治的唐代之稳固。继元灭宋后重演少数民族征服全国的清朝，在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之前，从 1616 年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即有称雄周边大区（关外）的实绩；1644 年世祖入关、定都北京后的统治期间及鼎盛时代的版图，都超过攻灭南宋后统一中国的元朝。《辞海》称元自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之年（1271 年）起共历 11 帝、98 年，而历史上泛称的元朝自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 1206 年建立蒙古汗国起，至朱元璋（明太祖）军攻入大都（今北京）为止历 15 帝、163 年。元不及清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不善于利用汉人治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打造的“盛清”（原创概念）堪与盛唐比肩，就有赖于“满汉全席”（转“席”为席卷之意的形容）般的满族带动汉族。

1970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对“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表示支持，蔑称“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并总结了“无数事实证明”的“一条历史的规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中共从一小股弱势群体不断地发展壮大，把有美国撑腰的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赶到台湾海峡对岸的边隅，加上抗美援朝战争中与武器装备等占优势的“联合国军”打平，都使这一论断具有令人信服的底气。中共得以建政的秘密早在 10 年前毛即有揭示，《〈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年 10 月 4 日）一文，从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中提炼出战胜敌人的 3 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作为基本武器的前两项以统一战线打头意味深长，而其 3 个世纪前满族以少胜多、以少制多的成功，从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起，也有借助汉人打、压、管汉人的统一战线之功。明朝被李自成农民大起义和清兵进犯的双重打击推翻，自有治久必乱、聚久必散的历史循环，以及失道寡助而亡的气数大

限所定。清朝比元朝长命也由于得统治之道（门道）而多助，后变成“纸老虎”轰然倒下的失道寡助，“道”若联系“太初有道”而兼作语言讲，也在更宽的范围、更高的层次上具有史鉴作用和实践启示。

将近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6 次人口普查(2010 年 11 月上旬实施)结果(数据未做任何误差校正,未包括漏登的人口和 230 万现役军人,不包括 465 万难以确定常住地的人口),显示大陆地区满族人数达 1 038.7 万(百位数以下在此切割,不加以四舍五入)而为第 3 大少数民族,仅次于壮族(1 692.6 万)和回族(1 058.6 万),从上次普查(2000 年)的 1 070.8 万(第 2 位)减少、下降,和回族及一并首次跻身人口过千万的“大少(数民)族”之列的维吾尔族(1 006.9 万)反差强烈。10 年前为 840.5 万的维吾尔族超过苗族(两次分别为 894.5 万、942.6 万)而从第 5 升至第 4,以此势头推移则下次普查时满族的席次势必被维吾尔族取代,再下次则恐怕会被苗族和彝族(776.5 万、第 7 → 871.4 万、第 6)赶到后面。值得深思的是少数民族中排第 1、2、4 位的壮、回、维吾尔族,以至第 8、9 位的藏族(628.2 万)、蒙古族(598.1 万)都有自治区,而这 5 个民族的地位除了居住地较广大、集中,独立于汉语的民族语言的牢固地位也至少当为其中 3 族的重要因素(有本族语文而通用汉文的壮族和无本族语文而通用汉语文的回族,则似乎较多地有赖于人口规模或与境外多国相通的宗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满族尽管如此人口众多,并曾为中国史上有数的长命王朝的主宰民族,满语今天却因使用者寥寥无几而面临绝迹。

1979 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主张两岸应进行直接通航、通邮、经济交流,此后形成的“三通”说法以通邮为首,通航为其后或在通商之后。4 月 4 日国民党总裁蒋经国以“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对抗,但双方后来经过长期渐进的接触、谈判和妥协,直接、全面、双向“三通”中的通邮、通航终于在 2008 年 12 月 15 日实现。沟通两岸、改善关系以通邮当头开路,像是“太初有道”之“有言在先”的变种,杜甫《春望》诗的首联“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后,也有颈联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两岸打交道的“交·道”字面对应通航的人际交流和通邮的语言交流,含“打·交”的“不打不成交”之“成交”对应通商的经贸交流,而清朝以来满、汉两族经“打”成“交”,能想到“一个半通”——普遍通婚和单向通言。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语文同化,与世界史上可见的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民族净化”正相反。上帝制造“语沟”而使“巴别工程”顿挫,满、汉同席的填平“语沟”则可称作“语通”。

1984 年 1 月 7—16 日访问美国的赵紫阳总理对里根总统表示:“(我们的政策是)不吃掉也不化掉台湾。”随行翻译施燕华感到“化掉”不像“吃掉”可照字面翻,绝对不是和“吃掉”同意的“熔化掉”,这“化”应是“社会主义化”或“共产主义化”,鉴于给邓小平做翻译时常听他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说台湾可实行“一国两制”、社会制度等不变,就大胆地译为“不把大陆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台湾”。对领导人的这类生动的口语化言辞,她称如果吃不透精神就容易翻错或翻得词不达意,而看到在座的驻美大使章文晋微微点头,感到自己闯过了“险滩”。¹⁵⁾以这个巧越“语沟”的遣词反观清朝,不妨说是**满族统治者吞并本土、强加制度等于汉人后,在企图同化掉汉族的过程中反被其利用的汉文化所改造**。“吃透精神”的字面也能借来讲汉族被“吃掉”领土和主权后,在精神领域暗中施展的可谓“逆洗脑”的渗透。杜甫《春夜喜雨》诗的颔联“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形容其和风细雨式的潜移默化亦属贴切。晚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里“联俄”和“扶助工农”之间的一项,在无本人或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20—30日,于广州)的文字记录的情况下,国、共两方出于各自的立场和需要等分别作“容共”、“联共”,而**容汉乃至联汉的满族统治者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被溶掉了本民族文化**。由此可知,**水到渠成、温水煮蛙般的“溶”或“融”,威力不亚于高温、高压、高调、高效的“熔”或“镕”**。

《道德经》第36章中紧接“柔弱胜刚强”的命题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庄子·外篇·胠篋》亦引用的此言,也能够提示**远离母语如鱼脱渊,而不可示人的国之利器往往是暗器**。清朝的满族军事上以少胜多和文化上“寡不敌众”,以及一度为亚洲最强国(《辞海》称“至18世纪后期,人口增至3亿左右,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强大的国家”,不知东亚之外是否还有更强的亚洲国家;而该词典对历代王朝的说明中关于洲内国力排榜,此外只有汉朝的“汉武帝时成为亚洲最富强繁荣的多民族国家”,盛清之突出的强大因而可见一斑),在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又急速凋落,被列强瓜分大量国土,最后被前朝的主体民族——汉族起义推翻,给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局面和封建社会的历史同时画上了句号,而末代王朝的强弱交错、起落悬殊的特异性值得深掘。《道德经》第61章的“大国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有1839年赴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撰联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证,雌性一惯用以赢过雄性的方法是用宁静来显示谦下,这“谦”的“言·兼”字形在此文脉中,正应了在下的大族以语言兼并了在上**的强主**。

和平演变:汉语文、日语文对非主体民族语文占据绝对优势的历史过程

二月河著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下(第3)部《恨水东逝》(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中,第41(总第143)回《意未尽恰亲王骑鲸 情恋误雍正帝种祸》写,雍正(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稹],1722—1735年在位)之弟(排行十三)允祥在将到弥留的回光返照之际,为给皇上留遗言而求有特异功能的道长贾士芳发功遥控护持延命1个时辰,还叮嘱其他人一道去东厢配房后要专心陪贾谈话、下棋,待众人退出后答雍正问候说:“吉隆里河,英不撒坦切用,德台吉博克隆

汗罗风。”(古蒙语, 意谓: 大皇帝, 我有要紧的话, 别人不能听。)雍正愣了半晌才醒过神来, 用满语说道: “弟弟, 你用满语说话, 他们是听不懂的, 用蒙语我听着太费力, 你也太耗神了。”那位康熙帝第十三子便用熟练的满语说: “你寻机会杀掉这个道士。”接着解释是因此人能用巫术“操纵您的健康”, “迟早有一天他会反过来要你作他要作的事”, 推荐了唯一胜任的执行人并得到首肯后, 大约是说满语太耗神而改用汉语: “皇上啊, 我的四哥……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有些心里话说出来, 知道四哥不会恼我, 可也耽心四哥以为我是临终的昏话……”¹⁶⁾

允祥(爱新觉罗·胤祥)当父皇生前就在弟兄间唯与雍亲王胤禛关系最密, 胤禛继位后即被封为和硕怡亲王、出任大臣, 因治绩助力甚大而得世袭罔替的许可、为铁帽子王; 死后雍正令享太庙、为纪念其功而将名中的“允”字改回“胤”, 遂成清代臣子中不避帝讳的无二事例。雍正感言“咸谓圣王贤臣之相遇数千百载而一见, 今且于本支帝胄之间得之”, 在历代王朝中罕见的这对兄弟君臣间的至诚相托和精忠报效, 只须看雍正为防篡权而残酷对待几位兄弟(康熙的三子允祉被革爵禁锢; 八子允禩被改名作“阿其那”[狗]、遭圈禁; 九子允禩被安上“赛思黑”[猪]的恶名、发配西宁; 十二子允禩被革职; 十四子允禵被降爵、拘禁), 就可知绝非由于满族统治者不如兄弟阅墙屡见不鲜的汉族统治者心狠手辣。两人永别前的肺腑之言最终用比熟练的满语更省力的汉语, 作者也许是有意反衬开头讲蒙语、满语的不寻常。能看破隐私、会呼风唤雨的那个妖人正是被老谋深算的允祥抓住了软肋, 他再神通广大也既听不到又不懂拿异族语言进行的密谋, 不久就在精心设计的勾魂温柔乡中被冷不防地斩首, 不怕火烧水溺、雷击刀斧的非凡真功也没能保命, 正可谓“魔高一尺, 道(兼指正义及语言)高一丈”。这一情节或许纯属文学虚构, 然而正如“或许”字面包含的“可能·容许”, **源于现实的假想作为高于现实的创造亦可折射现实, 此场景中就能看到有 3 点本质真实。**

首先是满族统治者逐渐被汉语文化所同化, “和平演变”的突出事例之一见于乾隆 40 年(1775 年), 来自盛京(清留都, 即今沈阳)的满族旗人果尔敏考取笔帖式补放户部, 吏部引见时皇帝因其出身和专事满、汉文翻译而用满语交谈(反过来说, 如无该职务的特殊性则也许不用满语), 不料他除了背诵履历外对满语一概不知。¹⁷⁾清史全程时段中点附近的这出笑剧预示着满族转向汉化的加速, 朝廷规定盛京官员上奏折须用满文(实在困难时可兼用汉文), 但尽管盛京将军琳宁只用汉文受到乾隆训斥, 乾隆末年时盛京的满族官员不会写满文已不足为奇。¹⁸⁾前清的朝廷文书(尤其是涉及军机、边疆、八旗事务者)以满文为主的传统, 在康熙(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1661—1722 年在位)至乾隆三帝的盛清也未能维持到底, 但重用蒙语、满语讲核心机密的警觉和皇帝对蒙语已生疏这两点, 使这个细节能具备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允祥在生命之光将熄时改用汉语剖白心迹, 假设是为着节约能量或准确表达, 则作者的造型可说是母语已由

满语变到了汉语。

《雍正皇帝》第3部第45回《义灭亲挥泪诛亲子 勤躯倦忧时托政务》，写弘历从书架上取下宋版《易经》翻开给父皇（满语：汗阿玛；汉化称：皇阿玛）看，雍正见是已故的允祥所写“诛贾士芳”的纸条，目光一闪说道：“你十三叔曾跟你说过么？……他（贾）有神通，……你要谨密，说不定他能猜测出你这纸条的！”未来的乾隆皇帝笑着断言：“他要能连《易经》都看穿了，也就制不住了。”¹⁹⁾ 在用来传递信息的这本书里夹的纸条上写的想必是汉字，而托付后事的高险内容不用万一被贾看到也无妨的满文，既跟临终时用更保密的蒙语之谨慎相矛盾，又和当时宫中诸公也习惯用汉语的实情相符合。雍正对汉族知识分子改变上代以笼络为主的政策而兴文字狱，但**先帝命编纂《康熙字典》（42卷，康熙55年[1616年]印行）这类容汉文化建设，潜移默化地铺垫了融入汉文化的轨道。**

19世纪起满文从清廷官方公文中日趋消失，及至20世纪初的1901年9月7日（光绪27年7月25日[农历]），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签订的《辛丑条约》，只备法、英、德、汉4种文本而无满文，这无异于对内外宣告汉语取代满语而为国语。²⁰⁾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整212年前的1689年9月7日（康熙28年7月24日），中、俄签订的《尼布楚议界条约》仅有满、俄、拉丁文本（以拉丁文为准），汉文则只是和蒙文一道跟这3种文字刻上界碑。上年8国联军侵华后被迫接受的这个**丧权辱国之约留下“九七国耻”的烙印，而对满族统治者来说似乎还有受多国列强欺侮之余丧国语、辱列宗的味道。**这时掌政的慈禧太后也惯用汉文、不通满文，表明满文化被汉文化吞没大致已成定局。

分久必合的大势在这里发展到21世纪初满语濒临垂死，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三家子屯，于《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年建立后时经318年的2007年，在生活中以满语为首选语言的只剩下3位8旬老人，有专家因而预言活的满语随“活化石”去世而消亡的时限不过10年。母语为满语的15位老人对此多以农民及满族式的大大咧咧不感痛惜，而“没了就没了呗”的**满不在乎恐怕也是晚清满族统治者听任民族语言沦丧的心态。**当然**满语让位于汉语也能部分归结于其质朴的特征**，直观性强而拙于思辨的短处在控制汉人、对付洋人上都势必处于不利。²¹⁾ 有一种看法认为文明较低的民族或国家即使以武力征服了文明较高的民族或国家，最终在文化上也会被同化甚至兼并，而**满文化淹没于汉文化的结局不妨说体现了满清统治者的务实志向**，变作首选汉语即不无“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的价值取向。

民族、国家平等论者会认为文明无高低之分，而不认可**软实力反败为胜盖过硬实力**之说，《辞海》的“汉族”条目却一方面在介绍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宗教信仰之间称：“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与各兄弟民族之间发展了政治、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并吸收了他们的优秀传统。”又于“在党领导下，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宣扬：

“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般走在各兄弟民族的前面，在国家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不讳言先进既是实事求是又是当仁不让**，和孔子所言“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相异的是不无以先行导师自居。对国家生活的主导放在中共建政后叙述，就与元、清时代处于被动不相矛盾，而现政权对主体民族顺理成章地当家做主的自豪也溢于言表。按“民主主义即多数的力量”这一说法，则**元、清两朝单凭非主体民族统治就够不上民主了**。

该条起首定位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并做如是说：“由古代华夏族和其他民族长期融合而成。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各少数民族的成分，使自己更加壮大。”明言领先于其他民族、主导国家生活的那句后的整条结尾则为：“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和各兄弟民族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关系。”从诞生到发展都离不开多民族大家庭内相对关系的汉族在释文中，有3处“和其他（或：各兄弟）民族”、2处“与少数（或：各兄弟）民族”（前者为下引的“在边疆地区则多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和”、“与”在同有这2字的日文中所无的词性及用法，有表示平等的联合关系的连词和表示跟某事物有联系、引进用来比较的对象等的介词，而在这对相关群体关系中**“和”的字面比“与”更符合“平等、团结、互助、和谐”**。1949年4月10日毛泽东接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刘斐等后请吃饭时，刘机智而又自然地试探毛会打麻将否，听答“晓得些”就问爱打“清一色”还是喜欢打“平和”，知其用心的毛差点失笑喷饭，当即回应“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²²⁾他治世却奉行“清一色”而直到胡锦涛时代中共才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汉族在前的上述“与”也因该字作动词可指“给；授”而主导性成分较重。多用于口语的“跟”作为连词和多用于书面的“与”都表示平等的联合关系，用作连词时一般倾向于用“和”而较少用“跟”，²³⁾或许也因为作动词有“紧随”之意而带不完全平等的语感，而**紧接在后朝向一方向行进为动词首义的“跟”倒也适合少数民族对于在前当头的汉族的位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朝的满族统治者由于失道寡助和寡难压众而未能实现“清一色”，反而被汉文化的染缸浸泡掉了“清（代之）一色”。

可以和满语的命运相提并论、对照考察的，是日本唯一的少数民族语言——阿伊努语的衰微。《辞海》没有“阿伊努语”条目，而在“阿伊努人”的释文中提及：“日本的少数民族。约3万人（2001年）。日本学术界通常认为其祖先即古代的虾夷。原住本州诸岛，平安中期后移北海道，少数远移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等地。说阿伊努语，通用日本语文。信仰多神，行熊崇拜，部分从事渔猎，部分从事农业。”《日本国语大辞典》第2版（日本国语大辞典第2版编辑委员会、小学馆国语辞典编辑部编，[东京]小学馆2000—2002年刊，正文13卷，另有汉字、方言索引及出典一览1卷）的“阿伊努”（アイヌ，读Ainu）条则为：“（阿伊努语 aynu，意为‘人’）往昔广泛地分散世居于北海道、桦太（萨哈林）、千岛列岛（库里尔）、堪察加半岛、本州北端地区的民族。现主要居住在桦太、北海道。关于人种系统诸说不一，尚不明确。古时结成称作‘コタン’（按：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读 kotan) 的聚居区,基本上以狩猎、捕鱼为生。近世受到松前藩的统治和剥削,明治时代(按:1867—1912)起由于政府的同化政策而加速混血,固有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大量丧失,人口也急剧减少。现在,为确立其原住民族权利的运动以各种形式展开。阿伊努。”(文中桦太、千岛列岛之后括号内为俄罗斯名称,“库里尔”原文作“クリール”[读 Kuriru],“千岛列岛”条目中则为无长音的“クリル [Kuriru] 列岛”;“阿伊努”[アイノ/Aino]则另有专条介绍是阿伊努的古称。)

译文中“世居”和“原住民族”原文为“先住”(せんじゅう/senjū)和“先住民族”(后2字作“みんぞく/minzoku”),汉语“先民”(书面语)指古代的人、古代的贤人,和“贤人”同音的“先人”指祖先或已死的父亲,称死者的敬辞“先”之例还有“先贤”、“先哲”、“先烈”、“先父”、“先祖”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刊)的“先辈”条目,除了和日语语法相通的“①泛指行辈在先的人”,还有“②指已去世的令人钦佩、值得学习的人”(示例“继承革命~的事业”),因而对现存的族群宜用“原”而非“先”。该词典如此说明《辞海》未收的“原住民”：“某个地方较早定居的族群；世代居住某地的人：美洲～。也叫土著。”“土著”释文仅为“原住民”似乎意味着原有的“土”说法趋于被后来的“原”名称取代，但1993年由3年前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而作的“International Decad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汉语官方通译仍为“世界土著人国际年”（亦称“国际土著人年”）。《辞海》解释“古代游牧民族定居某地后，不再迁徙的称为‘土著’”，“后指世居本地的人。与‘客籍’相对”的这一概念的相关条目“土著社会”则释为：“亦称‘民俗社会’。以小型、封闭、不开化和同质性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形态。以血缘关系组成，成员群体凝聚力很强，人的行为是自发的，但受传统习俗和神权的严格约束；社会文化基于口头传授。”

2年后刊行的《现代汉语词典》不以“土著”为主条目，恐怕也有回避封闭、不开化等“土气”的因素，然而原住民的别称“原始居民”之“原始”作为属性词，也有“①最初的；第一手的。②最古老的；未开发的；未开化的”这两重意思。**土著社会的特征在此论考中可参考的有群体凝聚力和习俗、神权的约束力**，社会文化基于口头传授这一点也见于阿伊努族文化遗产的储存方式。同时又能看到在**该小民族的几乎丧失殆尽的固有文化传统中极度显著和最为基础的，就是被当年“脱亚入欧”的当局嫌“土”**（民间[沿用]的；非现代化的[区别于‘洋’]）的民族语言。1869年“虾夷地”被命名为北海道而为日本的组成部分后，不少和纯日本人不同的阿伊努人习惯（如死了人的家要把房子烧掉；男子戴耳环；女子文身）被废止，在推行硬性起名编入户籍等同化措施的同时，又从官方立场定性为“旧土人”加以歧视。1899年制定的《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并没能阻止“和人（大和民族的日本人）社会”的压迫，阿伊努人生活水准低下和语言、习惯丧失的趋势也未能扭转，而直到1997年公布《阿伊努文化振兴法》后《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才

作废。²⁴⁾

《日本国语大辞典》的“阿伊努语”释义作：“阿伊努的语言。据称现在作为日常会话用语几乎不使用，仅有人记得旧时的祈祷、故事等。保留着优秀的口头传说，如以‘尤卡拉’（按：原文‘ユーカラ’[读 yûkara]，是原意为“模仿”的阿伊努语 Yukar，即阿伊努族长篇叙事诗）为代表的口传叙事诗等。被认为和日语关系深，但系统不明。然而互相借用单词，进入日语的阿伊努语单词，除了东北、北海道的地名外，只有‘コンブ’、‘シャケ’、‘ラッコ’（按：分别为海带[写‘昆布’，读 konbu]、鲑鱼[写‘鮭’，读 shake]、海獭[写‘海獭·海獺·獺虎·獺獺’，读 rakko]）等少数。相反，进入阿伊努语的日语单词非常多。‘カムイ’（按：指神威、神居的阿伊努语，读 kamui）被认为是日本古语 kami（神）的借用语。阿伊努语。”（“阿伊努语”如另条介绍，同“阿伊努语”。）**《辞海》所称阿伊努人“说阿伊努语，通用日语文”，就现状而言前一半已不准确。**2009年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认定阿伊努语为世界上面临灭绝的语言之一，阿伊努人对此也深感危机，于是北海道现有15个阿伊努语教室，**但因明治政府对阿伊努的民族同化政策禁止使用该族语言，能自如地讲阿伊努语的阿伊努人已近乎全无**，不少教室是由学得阿伊努语的“和人”（日本人）来教阿伊努人。²⁵⁾

和两国词典关于阿伊努族、语的解释成为对照的，首先是《辞海》的“满族”条目：“中国少数民族之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为主体，融合其他各族而成。其族源可追溯至肃慎及挹娄、勿吉、靺鞨、女真。1070.8万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辽宁、河北、黑龙江、吉林等省，并居于北京、成都、西安、呼和浩特等大中城市。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曾有文字。现在除黑龙江省黑河市和富裕县内几个屯有部分人能说满语外，普遍使用汉语文。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继位后改女真为*满洲，翌年改后金为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定都北京后，大批满人入关，形成了满汉杂居局面。以农业为主，兼事捕鱼、牧畜、养殖业等。旧时主要信仰萨满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单独建立了十几个自治县，并与蒙古族联合建立了一个自治县。”释文中词语前加*表示另有专条可供参阅的“满洲”，说明为：“清代满族自称。满族原为女真人后裔。明时以建州女真为核心，结合女真其他部和汉、蒙古、朝鲜等其他民族形成。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废除诸申（女真）旧号，定族名为‘满洲’。辛亥革命后通称为‘满族’。”**满族的这番历史中可看到组建和通称出现都不算早，兼容数族而成后又大规模地和汉族杂居，加上地域分布较广而散，似乎都能视为凝聚力相对低下的固有因素。**

再看“满语”的释文：“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在黑龙江黑河、富裕有人使用。满族绝大多数人已转用汉语。有元音和谐律。词的语音结构以开音节占优势，除状词外，只有辅音 n 能出现在词末。名词可以接格、复数等附加成分，但缺乏领属形式，动词没有人称范畴。满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语既有黏着语的特点，又使用虚词作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与之关联的“满文”条目作：“中国满族使用过的文字。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额尔德尼、噶盖奉清太祖之命在蒙古文字母基础上创制。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达海采用在字母旁边加点加圈、改变某些字母的形体、增加新字母等方法，区别原来不能区别的语音，称‘有圈点满文’。改进前的文字则称‘无圈点满文’。满文直写左行。……”附上意为“实事求是”的满文示例的该条，**以过去时表现宣告满文已成基于垂死的满语的死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壮文”条目：“中国壮族的文字。原有方块汉字。1955年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武鸣语音为标准音。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推行。1980年进行修订，全部使用拉丁字母。”所附横写右行的示例(意为“只要努力干，什么事都能做成”)，也是经建政后创制、“第二次开国”(改革开放)后修订的进化结果。“壮语”条目说明“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广东连山、怀集等县”(云南后有“省”而广东后无有欠统一，而值得注意的是自治州名中两个民族之间不像省、自治区之间或县之间那样加顿号，这种形式至少在客观上更具有紧密相连和平等一体的效果)；“壮族”条中的“民间曾创制和使用过汉字记壮音的方块俗体字。新中国成立后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拼音的壮文”，**说明这场文字改革旨在以简便的规范取代繁杂的俗流，进而还可想到恐怕亦暗含剪除少数民族独创的汉字分支的功用，而不论有无维护主体民族语文的纯洁性的意图，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扶植、改良可谓建设性的国家工程。与此同时未对已有的满文存续加以力挺，不免会招来是否有对“满清”的旧怨作祟的臆测。**

“壮族”条目接着所称的“通用汉文”，意味着“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释文首句)实行“双语制”，而建政后创制的老、新壮文最终都实际让位于汉文。和壮、满共为少数民族中人口前3位的回族，在《辞海》的该条目中关于语言仅有“通用汉语文”，自然也就不存在“回语·回文”的概念。回族“以13世纪迁入中国的中亚、波斯、阿拉伯人为主，也包括公元7世纪以来侨居中国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后裔在内，在长期发展中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族成分逐渐形成”，**祖先远离汉语文圈的回族之入乡随俗，当是吸纳、顺从所在国主体语言的结果，“散布全国，主要与汉族杂居”亦可视为重要因素。**《辞海》介绍居第4位的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有文字。”“维吾尔语”释文称“主要分布在新疆”，并指出“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借词在词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维吾尔文”介绍这种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已有近千年历史，“维吾尔族历史上曾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使用时间最长，文献最多。”该条附有从右到左横行书写的维吾尔文示例(意为“岩鹰换翅”)，**维吾尔族及其语文和壮、满、回3族截然不同的是，在相关条目的说明中和汉语文毫无相关。**

和维吾尔族一道对回族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的蒙古族亦然，该条释义中关于语言仅提到“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有文字”（和上引“维吾尔族”中所属语族后、“有文字”前的标点不知何故相异）。“蒙古语”条目简介分布在中国（内蒙古、辽宁、吉林、新疆、黑龙江、青海、甘肃）、国外（主要在蒙古国）的该语言的特征，“蒙古文”释文则称：“通常指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已有700余年的历史。字母上下连书，行款从左到右。……在蒙古国，20世纪40年代起，改用以西里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这3条中唯一和汉语文沾边的是中国蒙古文示例意为“今古奇观”，同名的明人拟话本选集的编者“姑苏抱瓮老人”，不像《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带少数民族成分（满洲正白旗包衣[奴仆]）。同样有自治区的藏族专条介绍作“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使用藏文”，“藏语”称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藏文”为“中国藏族的拼音文字。在国外说藏语的地区也有使用”，“7世纪时图弥三菩扎参照梵文字体创制”后“历史上曾用藏文翻译和编写了大量书籍”，自左向右横写、有楷书和草书两种字体的藏文的示例意为“吉祥圆满”。

《辞海》第6版问世时西藏、新疆少数民族独立运动的分裂行为愈演愈烈，而以该词典中对几个主要少数民族的语文及宗教信仰为线索考察，可发现都**保持本族语文而不通用汉语的3个大族（其基准为人口多或有自治区）中，藏族的“信仰藏传佛教”比蒙古族的“多信藏传佛教”和维吾尔族的“多信伊斯兰教”更广泛、坚定，而维吾尔族对中央的离心力强于蒙古族，除了新疆和西藏都地处“天高皇帝远”的边陲，似乎也有语文、宗教跟域外异邦同根的缘故。**汉语和藏语正如同属的汉藏语系的名称可见的对立统一关系，《辞海》的“汉藏语系”条目界定范围为：“分布在中国和泰国、缅甸、老挝、不丹、尼泊尔、印度、越南等国，包括汉、藏缅、壮侗、苗瑶四个语族的语言。”中国头号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在其中和主体民族的语言同居，而壮族有既具备本族语文又曾借用汉字、现通用汉语文等双重性，联系该族“主要信仰多神，崇拜祖先。道教、佛教有一定影响”，对照汉族的“有多种宗教信仰。崇拜祖先。佛教、道教亦多有传播，少数人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不妨推论汉、壮两族在语言、精神上有自然靠拢的趋势。回族的“多信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族一致，但无本民族语文而通用汉语文则正相反，宁夏回族自治区被视为境内外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渗透的重点区域，²⁶⁾但民族分裂运动远没有新疆势头大，也许还不完全是少数民族占全区比重高低（宁夏约为36%，新疆约为6成²⁷⁾）所致。满族的“旧时主要信仰萨满教”反过来说，就是现在并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甚至比有多种宗教信仰、崇拜祖先的汉族还接近无宗教，而**丧失本民族语文和缺乏共同的精神支柱，或者能算作当今满族的存在感和人口不成比例的原因之一。**

1948年12月1日由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的第1套人民币上，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题写的“中国人民银行”等均无少数民族文字；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第2套，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在纸币背面印有用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第3套(1962年4月15日开始发行)加了汉语拼音和壮文；1987年4月25日起的第4套在票面正面增加了盲文，汉字改繁体字、异体字、旧字形为简体字、正体字、新字形；建政50周年(1999年10月1日)之际开始发行的第5套，将壮文改为198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颁布的新壮文。**4种少数民族文字中人口最多的壮文出台最晚，这和蒙文在最前一样也符合两族自治区成立最早和最晚的“自理资历”深浅。蒙、维、藏的排列也和人口排榜顺序的维、藏、蒙大相径庭，按离首都的距离远近倒奇妙地暗合。**另一和人口多寡不成比例的排列，是第4套纸币正面的少数民族人物头像与面值：最小的1角是高山族、满族男子；2角是土家族、朝鲜族姑娘；5角是苗族、壮族妇女；1元是侗族、瑶族妇女；2元是维吾尔族、彝族妇女；5元是藏族、回族男子；10元是汉族、蒙古族男子，由高到低的蒙、藏、维、壮和蒙、维、藏、壮的文字顺序大同小异，当时人口占少数民族中第2位的满族处于最低。**同是通用汉语文而人民币上无本族文字的回族，却符合有自治区的地位而高出5档，满族不但未因人口多的资本和曾坐天下的荣耀而享受优待“红利”，反倒像要偿还历史债务或返归入关前偏安一隅的位置般地退到底部边角。**

有趣的是从下起的第3档的苗、壮和第4档的侗、瑶，正是汉藏语系中壮侗、苗瑶两个语族的交叉组合。《辞海》介绍苗族与历史传说中的三苗、九黎部落有渊源关系，“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有文字。1956年除改进了原有文字外，还创制了三套拉丁字母形式拼音的苗文。通用汉语文。”“苗语”释文称“分布在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等地。国外，在越南和老挝亦有”（“苗族”条目对人口分布的介绍重点及次序略有不同，作“半数以上在贵州，其余分布在湖南、云南、广西、四川、重庆、广东、湖北等地”），“苗文”条目附5种示例——湘西苗文、黔东南苗文、川黔滇苗文、滇东北苗文、滇东北老苗文（分别意为“雷锋小的时候”、“有了苗文眼睛亮”、“日子过得非常幸福”、“今年又逢好年景”、“今年又逢好年景，百花盛开果实盛”）。苗瑶语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南、中南和越南、老挝、泰国，苗语支包括苗语和自称为“布努”等的瑶族的语言和蕃语；瑶语支包括自称为“勉”等的瑶族的语言，海南省自称为“金门”的苗族的语言，老挝、泰国和越南（和该条目内前出的越、老、泰次序不统一）的瑶语，**构成语族的这两支都各含苗、瑶而体现出民族及语言的相邻、相交。**

源于古百越的西瓯、骆越的侗族人口有296.2万（2000年，下同。按：2010年为287.9万），“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原无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拼音的侗文。通用汉语文”；“侗语”释文介绍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等地；“侗文”（侗族1958年创制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有示例（意为“这孩子身体如老虎”）。人口达263.8万（2010年为279.6万）的瑶族主要由古代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发展而来，“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少部分语言接近壮侗语族。一般兼通汉语、壮语。民间曾创制和使用过汉字记瑶语的‘方块瑶文’。

通用汉文。”相关条目无“瑶文”而有“瑶语”：“有广狭两义。广义为瑶族使用的诸语言总称。包括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等。狭义专指勉语。”中共建政后有选择地扶助部分少数民族创制或改造其独特的文字，不难想像有显示致力民族团结并和汉语文字改革连动的双重战略意图。在中央协助下构建或装修而得的这些拉丁字母形式文字，跟其时国家推进确立的汉语拼音体系也形成了某种和（谐）协（调），不过通用汉语文的这两档少数民族即使改进乃至获得了文字，也因为掺有输液似的外来人工辅助成分而不免比固有原汁稍逊个性。上文中的“即使”及同义词“即便”、“即令”、“纵使”、“纵令”、“尽管”、“哪怕”、“就算”，在此正可以字面表现该事业之纵向指令的包揽速成、稳操主动的宽容诱导。

再上一档中和维吾尔族并列的彝族不仅人多、历史悠久（源于南迁的古氏羌人，与唐宋时的乌蛮有渊源关系），而且在部分通汉语文的同时有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文（《辞海》介绍这种彝族原有的音节文字“有历史、哲学、历法、谱牒、文学、医药、宗教等文献”，称“各地彝文在形、音、义上带有比较浓厚的地方色彩。四川凉山的彝文一般由右向左横行书写，云南、贵州一带的则由左向右竖行书写”，横写的彝文示例意为“山好就养羊”）。第2档的朝鲜族（源于19世纪中叶起从朝鲜半岛大批迁入中国定居）人口有192.9万（2010年减至183万），有本民族的语言（和阿尔泰语系相近的朝鲜语）、文字（创制于15世纪中叶，行款横竖均可的朝鲜文在《辞海》的示例意为“祖国的天空”）；和朝鲜族同档次的土家族先民与古代巴人有渊源关系，“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无文字，现仅有极少数人会讲本民族语言，通用汉语文。”“土家族”释文称分布在湘西、鄂西、渝南、黔东北等地区，“土家语”条目则介绍“主要分布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拥有803.7万之多的人口（居56个民族的第7。2010年增至835.3万，排位则被彝族超过而退至第8），却在央行纸币上面值居倒数第2，联系本无文字、建政后又未得创制文字的传统和现实，也符合本民族语文几乎灭绝的满族之人多而值低。

和满族并列的高山族主要分布在台湾省（近42万人），中国大陆的4488人（2010年减至4009人）主要分布在福建省，《辞海》接着分布及人口情况后详介：“语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因地区、语言的差异，内部有阿美人、泰雅人、排雅人、布农人、鲁凯人、卑南人、曹人、赛夏人和雅美人等不同的分支，使用不同语言。无文字。据文献记载，高山族祖先为百越中闽越的一部分。三国时代称‘山夷’，隋代称‘流求土人’，唐代以后陆续有祖国大陆和南洋等地的其他民族迁入、融合，明代称‘东番’、‘夷’，清代称‘番族’、‘土番’等。日本侵占台湾期间，被称为‘蕃族’、‘高砂族’。1945年台湾光复后统称为高山族。台湾当局一度称其为‘山地同胞’。”对语言的介绍在居住地区、人口数量之后和族内分支之前，正合“人口”的字序所象征的先有人后有言（口）；域、语之差与分支相异的因果关系类似蛋孵鸡和鸡生蛋孰先孰后的“怪圈”，“语”的“言·吾”组合在此又应了个人、民族、国家的语言对其主体性的形成及表现之重要。“高山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族语言”条目在说明这一多音节黏着语的特征之前称：“高山族所使用的诸语言的总称。分布在台湾本岛中部山区和东部纵谷平原及兰屿等地。属南岛语系。”句子的基本语序为谓语—主语—宾语的结构就和汉语有本质差别，但在不少该族人已会用汉语和该族语言吸收了不少汉语闽南话借词的当今，人口、住地的分布也决定了至少在大陆渐被汉语溶解之势难以扭转。钞票面值和满族同为最低的大、小两族之共同点，可举出《辞海》未提高山族的宗教和满族旧时主要信仰萨满教而现非如此，以及文字或根本不具备、或曾有而后亡。

“汉族”条目在不断吸收各少数民族的成分来壮大自身的发展过程之后接着写道：“人口约12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91%以上。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历史上曾有多次自黄河、淮河南下长江、珠江流域的大规模迁徙，现遍布全国，主要聚居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在边疆地区则多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另有数千万人口散居世界各地。语言属汉藏语系，通行汉字。已有四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和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物质、精神资本一并引以为豪的“有丰富的思想学说和文化典籍”，可谓大民族及由其主导的大国的“人·文力量”的尖端展现之一，这一综合实力的指标中“人”除了数量外更有集中发挥其智能的精英层——“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在以“目前则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截止的概括数千年历史发展经历的一句之后，内用4个分号隔开的句子列举了五大“人·文”强项，伟人辈出这条上接“农业和手工业素称发达”和“青铜器、丝织、陶瓷、建筑、绘画早负盛名”，“指南针、造纸法、印刷术、火药发明最早”置于第4条“有丰富的思想学说和文化典籍”后，整套“家珍宝库”包含了旧时儿童或文盲识字开头学的“人手口刀牛羊”这几个元素，而居正中的“人”后的“文”之“典籍”和“奠基”的同音饶有興味。该项之后的四大发明中造纸、印刷之法、术催生了文字记录、传播手段，而文化创造的有力工具及证明就是可考汉族4000余年历史的文字，拥有汉字的悠久传统和无文字民族无法考证及明示自身历史的尴尬处境有天壤之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所录孔圣人的这番话不妨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泰处由道”法术（谐“太初有道”音的这一创语指以语言、道理维持稳定），而人出生时便被赋予的特征符号——名字又提示着字和名的密切关联。

散居世界各地的数千万华侨、华人是中国人和汉语使用者的一部分，中国人定居海外乃至加入外国籍后仍保持对祖国的归属意识者甚多。和汉语因此在境外泛用、常用相映成趣的是，国内少数民族语言里“海外关系”密切的往往不易衰亡或受重视，其典型为蒙古语和《辞海》释义称“分布在朝鲜半岛全境和中国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的朝鲜语，及“国外，在越南和老挝亦有”的苗语、“在国外，缅甸、泰国和越南亦有分布”的彝语。朝鲜语“词汇中除固有词外，还有大量汉字词和一些外语借词”，但“朝鲜文”条目说明“中国的朝鲜文出版物……取消了夹

用的汉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用朝鲜字母拼写（该条并称韩国还夹用汉字）的方式接轨疏远了汉字，但跨国亲缘也会使声称与朝鲜休戚与共的**中国留意善待有“外戚”的“内亲”**。词汇中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借词占相当比重的维吾尔语和汉语文基本无关，而维吾尔族、彝族族人头像在人民币面值上同样比朝鲜族高3档。蒙古族同汉族并居于最高档在此也可由蒙古国亦用蒙古语文加以解释，藏族低1档就能用藏文“在国外说藏语的地区也有使用”的“外联”相对弱来圆此假说。毛泽东1935年10月在红军长征到宁夏南部后写下《清平乐·六盘山》，借词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字眼则不妨说长城之外的“非汉”亦能得好待遇，该地区的回族在纸钞面值上就和藏族属同一档次，而远高于入长城后被汉化的满族。

汉藏语系的4个语族中和汉、藏缅、壮侗并列的苗瑶，主要使用群体——苗族、瑶族在《辞海》里分别记述为：“半数以上在贵州，其余分布在湖南、云南、广西、四川、重庆、广东、湖北等地。大杂居，小聚居。”“大分散小聚居，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江西六省（区）山区，以广西为多。”在纸币7档面值中人物分别居下起第3、4档的这两个民族之上的彝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最大的聚居区，其余大分散、小聚居于滇、黔、川及桂等地。”几处“小聚居”和“大杂居”或“大分散”之间用逗号或顿号隔开或相接不分，与省或自治区用通称或略称的不一也许是同因工程庞大或技术性考虑而难于统一（如“彝族”条目现状为末尾句号后该行仅余1字空白，若用“云南、贵州、四川及广西”则发生篇幅增加的麻烦；但“瑶族”最后1行有足够的余白，并不妨碍“大分散”后加标点），而值得注目的是不论大小的“聚居”一词在上人民币图案的其他民族的条目里，只有“高山族”中的“以社为聚居单位，一社一般有六七十户”，以及“回族”中的“散布全国，主要与汉族杂居，以西北地区及河南、河北、山东、云南、安徽、辽宁、北京等省、市分布较多，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区”（“省、市”和“苗族”条中“省[区]”的表记相异也说明，“小聚居”前标点的有无或种类、省或自治区用通称或略称之差，对该大型辞书的编者来说可能是无须留意的细节）；“在回族聚居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建立过回族自治镇、区、乡”。苗族和有自治区的壮族并列而高于最低两档的满族和土家族、朝鲜族；有自治州为最大的聚居区的彝族和有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并列，高于有聚居但规模不大的瑶族和未言及聚居的侗族；2处提到“聚居”的回族和同有自治区的藏族仅次于最高档，都不妨用“聚居”字面提示的凝聚力来从一个角度探讨其排位的理由。

高山族释文同有“聚居”却面值最小而与此假说矛盾，可以想到的解释之一是该族人口总数较少，和上述另4族中最少的瑶族相比也不到其1/6。这一数字依据《辞海》词条的说明：“主要分布在台湾省。人口近42万（2000年）。中国大陆高山族人口0.45万（2000年），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分布在大陆者人数不知是否包括与多分布在台一句也断开的“近42万”之中，而大陆第5次人口普查所得的4488人（经调整加上27名现役军人而成的完备数字）作0.45万，显示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出记载概数时对尾数以下部分似乎没有“一刀切”原则，如朝鲜族的实数 1 929 696 人要是同样做四舍五入处理，则当为 193 万而非《辞海》所称的 192.9 万。这大概未必是对十位数和百位数有不同的规定并严格遵循的结果，而是像官方、媒体公布政要等的享年时往往按虚岁算那样，按稍多些许的 0.45 万来给这个排倒数第 2 的小群体增丁添彩。孰不知这丁点增加 10 年后会反衬出减至 0.4 万的降幅之大，但第 6 次普查的结果又表明高山族不仅仍比珞巴族多，并随着上次排第 53 的塔塔尔族降到末位（人口由 4 895 减至 3 556）而从第 55 升为第 54。还须指出若按近 42 万算则在 2000 年取代水族（40.7 万人）成第 25，2010 年则大致在由第 26 升至第 25 的佤族（39.6 万→42.9 万人）之下，在退居第 26 的水族（41.1 万人）之上。

不过高山族即使以约 10 倍的人数跃过 56 个民族排榜的中线，比起人民币采用的其他群体来仍属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族民”。将“少数”、“民族”两词及各自的两字对调而成的这一创语，指人口远不及主体民族而为“少数”的族群里亦比不上逾千万或百万的“大族”或“中族”。千万、百万合成的“千百万”是毛泽东爱用的概数之一，1931 年春所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里就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在其格外欣赏的相声大师侯宝林（满族）后来谑称为“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亿万军民相信了他为防止“红旗落地”而称的资本主义一旦在中国复辟就将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共从当时到现在都认定建政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辞海》对中国及各民族的介绍显示了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谈得上制度复活与否的地步，但只要看毛治下的两场特大人祸、浩劫各使 8 位数之多的人饿死或遭迫害，就可知以“千百万”规模的受难图景来蛊惑人心有足够的威慑力。

在日语中仅指 1 100 万的这 3 字结合指人（用于计数）的“人头”（日语“人头”[じんとう/jintō] 同样在“人的头”之外有“人数”、“人口”意，但无《现代汉语词典》中的“③ [～儿] 指跟人的关系：～熟”、“④ 〈方〉 [～儿] 指人的品质：～次 [人品差]”），并联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 年）中的命题——“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还能悟到千百万人头的族群的凝聚力乃至数量本身都是相当可畏的实力。此话中的“千百万”在规范的英译里用“数百万、数千万”表达：“The force of habit in millions and tens of millions is a most formidable force.” 日语通译在数词上和英语相似：“幾百万、幾千万人の習慣の力は、最も恐るべき力である。”²⁸⁾ 而和篇名《共產主義運動内の“左翼主義”小児病》（助词“の”[读 no] 即“的”。亦作《共產主義に於ける“左翼”小児病》[“に於ける”〈における/niokeru] 即“在……中的”] 等）一样，从汉字即可与汉译直观对应又是两国“语缘”的生动体现。《日本国语大辞典》的“恐るべき”（可怕的；应当畏惧的）词条汉字只有“恐”这一种，而其“べき”（应当；可。读 beki）之前的该动词“おそる”（读 osoru）单独可写“恐る・畏る・怖る・懼る”，“恐

るべき”和汉语有“可畏”而无“可恐”的差异又隐现着“语沟”，同时还不妨从“恐”的“巩·心”字形去形象地理解**顽固的思维定势之令人畏惧**。

藕断丝连：日语吸纳、改制汉语而衍生似阴差阳错却别具情理的联珠妙词

《现代汉语词典》的“人头^②”示例为“按～分 | ～税（旧时以人口为课税对象所征收的税）”，日语也有的“人头税”可以引出同样进入日语却又淡出的“人丁”而有助于开掘这一文脉。新村出编《广辞苑》第4版（[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刊）的“人頭税”（じんとうぜい / jintôzei）条目，解释来自英语“captation; poll tax”的这个概念为：“原始租税形态之一。对所有个人一律课以同额的租税。作为不考虑人民负税能力的差异的恶税，于18～19世纪废止。”7年后的第5版把第2句以下改作：“对所有个人按人头课以同额的租税。被视为不考虑纳税人负税能力的差异而不公平，同时又被认为在经济上属于公正的税制。”2008年刊第6版（以下引用凡无标明者均为该最新版），则删去了“原始租税形态之一”。《辞海》的同一条目详介：亦称“人口税”的该制度欧洲在古罗马时已有，中世纪时各国相继仿行，因特权阶级可不缴纳而负税者实际上是贫苦阶层，故反对课征人头税成为当时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斗争之一；其后所得税、消费税普遍实行，此税逐渐废止；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各州政府对于参加选举的选民仍征人头税，1966年后停征（按：《广辞苑》第4版的18—19世纪废止说后删，对照这一事实也是稳妥处理）；“中国汉代征收的算赋，唐代征收的庸，宋代征收的丁钱，元代征收的丁税，明及清初征收的丁赋、丁银等，都属于人头税性质。”

“课征”和“苛政”的同音在此显出奇妙的关联，《现代汉语词典》的“苛政”条目为“指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政治：～猛于虎”，《广辞苑》、《日本国語大辞典》的“苛政”（かせい / kasei）条内特设分项“一は虎よりも猛し”（苛政猛于虎。助词“は”[wa]表示叙述的主题；“虎”读“とら / tora”；助词“より”[yori]用于比较；助词“も”[mo]强调更甚；“猛し”[《广辞苑》未标的发音《日本国語大辞典》作“たけし / takeshi”或“はげし / hageshi”]指勇猛、猛烈，《日本国語大辞典》标明亦写“武し”，上述异读的另一文言形容词2部辞书都写“激し・烈し・劇し”），《日本国語大辞典》对《广辞苑》也标明来自《礼记·檀弓下》的出典加以详引：“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略〉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为何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该词典的汉源引证中标点只有相当于逗号的顿号、相当于顿号的中间圆点及句号这3种，引文末尾一律不加标点和2部中国辞书时有不顾原状而原则上用句号结尾相成对照，本文尊重其体例而在最后的引号外标句号，“曰”后也不加原引文所无的冒号（竖列的日文基本不用而偶见转90度成横排的··）和引号，而“曰”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后可用逗号又见于《现代汉语词典》不出的此条在《辞海》的释文中的2种标法：“《礼记·檀弓下》载：孔子过泰山，见一妇人在坟前悲哭，使子路问之，妇人曰，公公、丈夫和儿子先后为虎所害，孔子问何不离此，妇人答：无苛政。孔子对门人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政，通‘征’。意为繁重的赋税和徭役比老虎还要凶暴可怕。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四。后亦以指政令的繁酷。”

孔子诞生(公元前551年)到中共建政(1949年)的整2500年,及其去世(公元前479年)至中共成立(1921年)的整2400年,都比严格意义上的千百万(100万)年长1倍多,上述古文足以证明汉语之本性不移的“超稳定结构”使当今中国的中学生也不难看懂。对比《辞海》的现代文叙述则显出**在中学亦设汉文课的日本理解程度未必亚于中国**,如“舅”是《现代汉语词典》字条释义里的“③〈书〉丈夫的父亲:~姑(公公和婆婆)”,但汉语中的使用频度远不及“①☒舅父:大~|二~。②妻的弟兄:妻~”,而日语就用无①②意的“舅”(しゅうと/shūto)和“姑”(同音或“しゅうとめ/shūtome”)称配偶的父亲和母亲。2部日本词典中除了分指丈夫或妻子之父、母的“しゅうと【舅·姑】”条目,还有合称配偶之双亲的“きゅうこ【舅姑】”(读kyūko),《日本国语大辞典》引证的“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也取自《礼记·檀弓下》。《现代汉语词典》不出的“舅姑”条在《辞海》中典据不同:“①朱庆余《近试上张籍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②岳父母。《礼记·坊记》:‘昏(婚)礼,婿亲迎,见于舅姑。’郑玄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参见‘外舅’(1924页)、“外姑”(1923页)。”各附古源的另2条在《现代汉语词典》仅有“外舅”(释义“〈书〉☒岳父”),《广辞苑》则“外舅”(がいきゅう/gaikyū)、“外姑”(がいこ/gaiko)立目齐全。

《现代汉语词典》有同为书面语、旧称的“xiǎozǐ【小子】”:“☒①〈书〉年幼的人:后生~。②旧时长辈称晚辈;晚辈对尊长的自称:~识之!|~不敏。”②的2条示例中加惊叹号的前者即见于上述孔子语录,而《广辞苑》中“しょうし【小子】”(读shōshi)的更多义项也含孔门语源:“①小孩。②律令制下称四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男子。少子。③[论语泰伯]师对弟子的称呼。门人。④自己的谦称。小生。”(②中的“律令制”是日本古代以律[“禁制法规”即刑律]、令[“教令法规”即法令]为基本法建立的政治制度,《辞海》亦立目介绍的这一国家体制所存在的时期史称“律令时代”,《广辞苑》在专条中界定为大化改新[645年]之后到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语文水准欠缺的部分现代中国人对“小子识之”不识真面目的可能性,在于不免以为“子”是轻声的发音误读产生语意误解,《现代汉语词典》中接上条之后的“xiǎo·zi【小子】”就是人们常挂在嘴上的高频词——“〈口〉☒①男孩子:大~|二~|小~|胖~。②人(用于男性,含轻蔑意):这~真坏!|~!你敢骂人!”对应这2个义项的日语分别有相对于“小家伙”、“家伙”的“坊や”(ぼうや/bōya)、“奴”(やつ/iyatsu)等,不知该词的日本人对夫子言“小子”

反不至有此误读也是“语通·语沟”交错而致的趣事。

《广辞苑》中“小子②”释文所举同义词“少子”在日语里为同音词,《日本国語大辞典》的“少子①”释义“年纪最小的孩子”,并举同义词“末子”(读法有“まっし/masshi”、“ばっし/basshi”和“すえこ/sueko”)、“小子”,引证“*战国策一赵策·孝成王‘丈夫亦爱怜其少子’”;意为“生孩子的数量少”的②仅有出处不明的示例“少子化”。汉语中作“少”分别读第4声、第3声的该词在《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均无收录,《广辞苑》则在基本同《日本国語大辞典》①的唯一义项后,从第5版起设分项“少子化”(しょうしか/shôshika)——“出生率低下,孩童数量减少。一九九二年度《国民生活白皮书》用此语。”(第6版在“减少”前加“持续”,并在该句后增添:“发达国家中大致都可见。”)这一新词不见于2部中国词典也因尚未达到成为社会问题的地步,而国际社会中“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又能以“苛政猛于虎”的汉、日微差去体味。该成语之“苛”也指《现代汉语词典》出条的“苛捐杂税”,《日本国語大辞典》释义未提繁重的赋税、徭役和日语无“苛捐杂税”、“苛繁重赋”,都符合古来在此领域的受难不及“民国万税”(谐“万岁”音的谚语)到“只剩屁无捐”的中国。“政·征”之含义相关的形、音相通在同读“せい”(sei)的日语亦然,日语也有同“课征”的“課徴”(かちょう/kachô),作为“賦課税徴収”之略载于《日本国語大辞典》(《广辞苑》则只有“課徴金”[かちょうきん/kachôkin]条目),该词所含的“課税”(かぜい/kazei)、“徴税”(ちょうぜい/chôzei)更常用,而和“苛政”读法相似的“課税·苛税”之同音也颇有启示。

中国古代的人头税名称从算赋、庸演变到丁钱、丁税、丁赋、丁银,始于高祖4年(公元前203年)的算赋之“赋”的“贝·武”字形暗合强行征收,后经“中‘庸’”(借“中庸”指中间之“庸”)而至4朝沿用的“丁”字系列,其历史跨上千年并包括蒙、满两族先后统治。《辞海》以“丁赋”为“亦称‘丁税’、‘丁钱’、‘丁银’”的主条目(未按“人头税”所列朝代顺序的这3条各有仅作“即‘丁赋’”的分项),该“中国历代征的一种丁口税”(该条释义)的同义异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丁”领头的19个多字条目里仅是“【丁税】古代的人口税”。一般对男丁征收而该赋税得名之字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属于“丁¹”,义项除了“①成年男子:成~|壮~。②指人口:添~|~口|人~”,还有“③称从事某些职业的人:园~。④(Dīng)姓”,而“丁”和“人”的组合恰带“人头;人口”之意。该词典的“人丁”条目作“①旧时指成年人。②人口:~兴旺”,《辞海》则多1个义项并全附引证:“①旧指成年人。《新唐书·食货志二》:‘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②人口。如:人丁兴旺。《红楼梦》第十三回:‘合族人丁及家下诸人,都各遵旧制行事。’③指家丁、男仆。《红楼梦》第五十九回:‘荣府内赖大添派人丁上夜。’”

《广辞苑》不收的这一单词见于《日本国語大辞典》的“じんてい【人丁】”(读jintei),同样引证《新唐书》出典(但《食货志》后未标“二”),释义“达丁年(二〇岁)的人。又指成人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男子。壮丁”。意为男子成丁之年的“丁年”在《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里无条目，而《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罗竹风主编，[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1994年刊，正文12卷，另有附录、索引1卷)，则带多条引证并介绍“历代之制不一。汉以男子二十岁为丁，明清以十六岁为丁。亦泛指壮年”。《日本国语大辞典》的以20岁为丁年也合现代日本男女成人的年龄，而《辞海》的“丁赋”称各代对成丁服役年龄规定不一，汉、晋初、隋初、唐初分别以23岁、16岁、18岁、23岁为成丁。《日本国语大辞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的界定差异姑且不论，《广辞苑》有“丁年”(ていねん/teinen)、“丁赋”(ていふ/teifu)词条而偏冷落“人丁”就显得奇怪。《日本国语大辞典》的“人丁”无示例似乎说明日语中在成为历史遗物之前就缺乏生命力，而须注目的与汉语相异之处是既不用于指人口，更谈不上和“兴旺”组成《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的该义项示例的熟语。《辞海》未录的“兴旺”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条目，“旺兴盛；旺盛：事业～|六畜～”的2条示例也足见较常用。日语的“兴旺”(こうおう/kôô)则因近乎死语而不见于《广辞苑》，和《辞海》予以除外相反的是《日本国语大辞典》里出条：“[名]（‘兴’意为起，‘旺’意为盛）昌盛。繁荣。”括号内说明所含的“兴起”(こうき/kôki)、“旺盛”(おうせい/ôsei)在《广辞苑》中都设条目，因而二者组合的“兴旺”之“出典”(借字面指被请出词典)值得琢磨。

该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和《日本国语大辞典》分别作形容词和名词，**辞书所标词性不乏同一单词在中国作动词或形容词、日本则作名词的差异**，也体现于《现代汉语词典》中“兴起”为动词、“旺盛”为形容词，而《广辞苑》不标词性的“兴起”、“旺盛”在《日本国语大辞典》作“[名]”、“[名]（形动）”（后者括号里的术语即具有形容词意义和活用变化的“形容词”，和“兴旺”作名词有别的这一添加却仍在名词定性的范围内）。《现代汉语词典》中“兴起”的2个义项为：**①**开始出现并兴盛起来：各地～绿化热潮。**②**〈书〉因感动而奋起：闻风～。”《广辞苑》的“兴起”释文“**①**开始。**②**势头旺。情绪感奋。‘感奋一’”，与之基本对应而仅**②**有示例也说明日语对汉语有相对多保留书面语的倾向；《辞海》未收的该词条在《日本国语大辞典》释义为：“**①**启动事物；使发生；事物出现。**②**使兴盛；使兴隆；振兴。兴盛。**③**振作精神。”**②**引证“*盐铁论一国病‘沛若时雨之灌，万物莫不兴起’”，**③**有“*孟子一尽心·下‘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篇名中“尽心”和“下”之间的圆点按该条目原状，该辞书亦有如“膾炙”[かいしゃ/kaisha]条引证“*礼记一曲礼上”、“*孟子一尽心下”的不加点方式，但因不见《凡例》对这类处理的具体规定而不知何为标准，下文中引“天誅”条内的“*孟子一尽心·上”亦任其不统一），**①**无渊源而较早的示例见于“*三国传记（约于1407—46？）四·一五”。《现代汉语词典》的“旺盛”义项少而示例多：“生命力强；情绪高涨；茂盛：精力～|雨水充足，庄稼长势～。”《广辞苑》的“旺盛”为“活力、欲望非常强烈。‘精力一’‘一的食欲’”；释义“充满活力；兴盛；兴盛貌”

的《日本国語大辞典》无汉源，示例出处为“*明六杂志三三号（1875）〈中村正直〉论打造善良之母”（该辞书体例依次为书刊名、出版年份、作者或译者、篇章名）。《辞海》的“旺盛”义项多、不乏示例而引证较少：“①情绪饱满；精力充足。如：精力旺盛；士气旺盛。②植物生长茂盛。如：麦苗长势旺盛。③生意兴隆。《鲁迅书信集·致沈雁冰》：‘此店貌似旺盛，而办事或失之太散漫，或失之太聪明，其实是很不健康的。’”从汉语早期用例出自曾留学日本、作文遣词有受日语影响痕迹的鲁迅，也能推断“旺盛”多半来自其61年前即有的日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刊《鲁迅书信集》下卷收录的8封《致沈雁冰》中，载于第1043页、编号为1265、写于1936年9月26日的信中有此句），而比“旺盛”早出现400多年的“兴起”在当今日本几乎不见，对照“旺盛”较常用而可想到日创词对汉源词似有“血浓于水”的优势。

《日本国語大辞典》的“兴旺”示例为“*读本·英草纸（1749）二”：“传闻花街柳巷是为兴旺（原注：热闹）”。《汉语大词典》显示该词在元代高文秀《襄阳会》第4折就曾用作“今日个宴享，众将受赏，万万载皇图兴旺”，《水浒传》第58回也写：“孔亮看见三关雄壮，枪刀剑戟如林，心下想道：‘听得说梁山泊兴旺，不想做下这等大事业！’”（回数的原文作十位数和个位数之间不加“十”的“五八”，和前出的《辞海》“人丁”所引“《红楼梦》第五十九回”的体例不同，在此因采取转述形式而用阿拉伯数字。）《日本国語大辞典》未标汉源不知是否因在日语中历来属于生疏，而值得玩味的是示例中的场所及其名称的由来。“花街柳巷”的原文“花街”注音训读（日文借用汉字写日语的固有词，而用日语固有词的音来读汉字）为“いろざと”（irozato），《广辞苑》中该词条“いろざと【色里】”的同义主条“色町・色街（いろまち/iromachi），即条目内所列的同义词——均指妓院或（卖艺不卖身的）艺妓陪酒场所集中处的“遊郭”（ゆうかく /yûkaku）、“花柳街”（かりゅうがい /karyûgai）；《广辞苑》有音读（用汉字原音〔因传入日本的时期、来源而分“吴音”、“汉音”等〕读汉字）的“花街”（かがい /kagai），但无《日本国語大辞典》出条的“柳巷”（りゅうこう /ryûkô）；《日本国語大辞典》的“花街”（注明亦读“かかい /kakai”）、“柳巷”都有汉源，前者就引证“*吕岩一敲爻歌‘花街柳巷觅真人，真人只在花街玩’”。同为汉源词的“花柳”（かりゅう /karyû）之②还说明是“花街柳巷”之略，但《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指妓院较集中的地方”的这4字成语并无出条。有趣的是该词典有“花柳病”（かりゅうびょう /karyûbyô，释义“[名]性病”）而无“花柳”，《广辞苑》的“花柳病”（释义“[在花柳场中感染的病之意]性病”），却是“花柳”条目内的3个相关分项之一，其前的“花柳界”（かりゅうかい /karyûkai）释义“艺妓、娼妓的社会”并注明同“花柳の巷”（“の”即“之”），“花柳の巷”分项的释文则为同义词“遊里。色里。花柳界”（日创词“遊里”〔ゆうり /yûri〕即其字面所含的“遊郭”、“色里”）。

《广辞苑》的“花柳”条文为：“①（王勃，诗）红花和绿柳。形容美。②（李白，诗）花街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柳巷(原文作‘遊里。いろざと’)。亦指艺妓、妓女。”引焉不详的2处汉源在《日本国语大辞典》中为:①“王勃一春园诗‘山泉两处晚 花柳一园春’”;②“李白一流夜郎增辛判官诗‘昔在长安醉花柳 五侯七贵同杯酒’”(该辞书引汉诗标题不加书名号,在此原样照录的句之间空1格而不加标点的格式,参照本文前后所引的其它诗句就可知并非规范)。①的释义也类似《广辞苑》而作“花和柳。花的红和柳的绿。形容美”,而对照《辞海》的“花柳”条目就可知**两国语文辞书对该汉源词及经典出处的理解差异不小**:“①指游赏之地。李白《流夜郎增辛判官》诗:‘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②指妓女或妓院。如:花柳场中。因称性病为‘花柳病。’”《汉语大词典》的4个义项中“①花和柳”的3条引证无王勃诗,为首的是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句“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②指繁华游乐之地”的2条示例先是上述的李白诗句,其后的明代李东阳《竹林七贤图》诗句为与其重叠3字的“应从晚岁看冰雪,不向京尘醉花柳”;“③指妓院或娼妓”的3个示例里最早者是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某少年常结豪族为花柳之游,竟畜亡命,访城中名姬,如蝇袭膻,无不获者。”“④花柳病的省称”(指示“参见‘花柳病’”)的示例取自殷夫《KingCoat》:“他是一个医生,专门治花柳啦,白浊啦等等性病的。”《日本国语大辞典》中②的4个示例里继最先的1806年刊文献所出之后,是“*横滨新志(1877)〈川井景一〉初序”的“妓院之营构(原文为‘構营’〈こうえい/kôei),花柳之光景,极其美”,而李白笔下的“花柳”被当作色情场所并加以繁衍恐怕在当时就已开始。现代诗人殷夫记述的病名之全称“花柳病”在《日本国语大辞典》里,释义“(多在花柳场中感染的病之意)性病。梅毒、淋病、下疳等”比《广辞苑》更宽泛;《汉语大词典》的条目说明为“性病的俗称”并写“亦称‘花柳症’”(日语无此“症”),所举老舍《四世同堂》29为例的内容提示着原创于日语的可能性:“现在,为慰劳日本军队,同时还得防范花柳病的传播,这个小机关又要复兴起来。”(不妨指出这段取自该长篇小说中有34章的第1卷《惶惑》,同于1946年出版的第2卷《偷生》的章数也作1—33,因而出典似以“《四世同堂·惶惑》二九”为更准确。)

有“花柳”而不出“花柳病”条的《辞海》与《现代汉语词典》相反互补,和该词典无“花柳”领头的词条成对照的是《日本国语大辞典》有9条——“花柳界”、“花柳街”、“花柳狭斜”(かりゅうきょうしゃ/karyûkyôsha,即花街柳巷)、“花柳社会”(かりゅうしゃかい/karyûshakai)、“花柳小説”(かりゅうしょうせつ/karyûshaosetsu)、“花柳通”(かりゅうつう/karyûtsû)、“花柳病”、“花柳物”(かりゅうもの/karyûmono,以花街柳巷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等作品的总称)。和其赠诗所赞孟浩然一样“风流天下闻”的“诗仙”、“酒仙”往昔醉在古都的“花柳”,其繁华游乐地之意被日语转变成形容花花世界,是**既像阴差阳错而又言之有理、别具情趣**。《辞海》中“花花”领头的2个条目都是日语所没有,其中“花花世界”之①正与“花柳①”相通:“《华严经·入法界品》:‘佛土生五色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后以‘花花世界’喻指繁荣地区。《禅

真逸史》第十五回：‘每想中原花花世界，一心要夺取宋室江山。’《后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游不了花花世界，看不了锦绣江山。’《现代汉语词典》的该条在1个义项中包含多个意思、双重形象：“指繁华地区或灯红酒绿、寻欢作乐的场所，也指人世间（含贬义）。”对照《辞海》的“花花世界②”可知**现今的贬义似为历史的变异**：“指人世间。屠隆《昙花记·冥官迓圣》：‘顺便往阳间花花世界游耍一回，好快活也。’”日语有形容词“花花しい・華華しい”、副词“花花と・華華と”（“花花”和“華華”都读“はなばな /hanabana”，“しい”、“と”分别读 shi、to），其意思部分类似于《现代汉语词典》释文而为“[~的] 状态词。形容颜色鲜艳多彩”的“花花绿绿”（示例“墙上贴着~的年画 | 姑娘们穿得~的，在广场上跳舞”均为正面形象），其鲜艳的华丽、显眼的兴盛也可使两国语言中均音同、义通的“花·华”作为依据，帮助理解“花柳”从中性的花花世界演变为“重性”（谐“中性”音，指侧重重性爱）的花花世界。“繁华”之后的“游乐”正合上述示例、释义中的“游（耍）”、“作乐”，而日创词“遊郭・遊里”及“遊女”（ゆうじょ / yûjo, 即妓女）都与“游”重叠，“花花世界”和“花柳界”的首尾2字相同也显示了汉、日“语缘”。

汉语独有、《辞海》不收的“灯红酒绿”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释义为“形容寻欢作乐的腐化生活，也形容都市或娱乐场所夜晚的繁华景象”。和“花柳”同兼繁华、腐化两面而现都侧重负面的这个成语，字、义又都通指花街柳巷的“红灯区”（“指某些国家或地区城市中色情场所集中的地区”）。接近这一概念的日语有“ネオン街”（《日本国语大辞典》无专条，《广辞苑》释义“霓虹灯满街闪耀的闹市”。“ネオン”即英语 neon [霓虹] 的音译，日语读音的罗马字母标记同为 neon），可意译“不夜城”的直译“霓虹灯街区”正可略作音同、字重“红灯区”的“虹灯区”；“ネオン街”的近义词“歓楽街”（闹市；花花世界。《广辞苑》释义“餐饮店、影剧院等享乐设施集中的街区”），还**奇妙地含于汉语**“寻欢作乐”的字、义之中，而“寻欢作乐”和同样未进日语的“寻花问柳”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恰好相邻（分别释义为“指追求享受、放纵的生活”、“指狎妓；嫖娼”）。“灯红酒绿”和“花柳”相结合则能引出“花红柳绿”，《辞海》带引证的其2个义项都是褒义：“①形容春天的美景。《喻世明言·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忽至春末夏初，天气不暖不寒，花红柳绿之时。’②形容颜色鲜艳多彩。《红楼梦》第七十四回：‘谁许你这么花红柳绿的装扮！’”《现代汉语词典》的①释义更生动地作“形容春天花木繁茂艳丽的景色”，并将《辞海》里1条3项的“花红”分2条：“【花红】¹ ①落叶小乔木，叶子卵形或椭圆形。花粉红色。果实球形，像苹果而小，黄绿色带微红，是常见的水果。②这种植物的果实。||也叫林檎或沙果。”“【花红】² ①指有关结婚等喜庆事的礼物。~彩礼。②红利。”

前者①的别称“林檎”有专条仅说明为“花红¹”，“苹果”条中不提的该词却是指苹果的日语“林檎·苹果”（りんご / ringo）的主要写法。《广辞苑》在条目词头并列的这2种写法在《日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本国语大辞典》中仅用前者，该条①释义为“西洋苹果普及之前日本苹果的总称”，引证“*白居易一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诗‘最忆东坡红烂熳，野桃山杏水林檎’”，列举同音异读的“りんきん”(rinkin)、“りんき”(rinki)、“りんごう”(ringô)、“りゅうごう”(ryûgô)都另列专条，其中《广辞苑》唯一立目的“りんごう”在此注明是“りんごん”(ringon)的“ん”(n)标作“う”(u。按：加长音符号^的ô发音即为ou)；4条例文之首为“*本草和名(约918)‘林檎一名黑琴’”(日本现存的最古老的这部药典书名中的“和”即日本、日语)，最后的“*本朝食鉴(1697)四‘林檎(古訓“利字古字、(りうごう)近代称“利牟古、(リムゴ)”)’也全用汉字(原文“古訓”[こくん/kokun]即汉语、汉字等的古代读法)，分别读ryûgô、ringo(条内以括号加的片假名[楷体字母]注音)的2词用和汉语发音不无相同的标记“利字古字”、“利牟古”(规范音读为riugou、rimugo)，也可作**日本直至江户时代(1603—1867)都相当普遍地多用汉字、汉语词的佐证**，并有助于体味日语固有字母相对于汉语称“假名”而非“真名”或“正名”。②详介江户时代传入日本、明治时代引进的西洋苹果(原产地为西亚至欧洲东南部)，无汉源引证而说明“汉语名称为苹果，但习惯用林檎”。

译文中的“汉语名称”原文“漢名”(かんめい/kanmei)，《广辞苑》的条目说明亦读“カンミョウ”(平假名[草体字母]作“かんみょう”[kanmyô]，另条仅用表示解说参见该项目的箭头号(竖行排的原书中作下向粗箭头号)指示“⇒かんめい”)，释义“中国的名称。如‘ハゲイトウ’叫‘雁来红’之类。“ハゲイトウ”即该词典立目的“はげいとう【葉鶏頭】”(读hageitô)：“供观赏的苋科一年生草本。原产印度。茎高90~120公分。叶呈细长的椭圆形，带黄色或红色、紫色的斑纹，非常美。从夏天到秋天，在叶腋簇生出黄绿色的小花。”所列举的相关词一是“アマランサス”(拉丁语Amaranthus的音译，读amaransasu。专条介绍即这种苋属园艺植物，又泛称苋科苋属[本是其学名]植物)，二是“鎌柄”(かまつか/kamatsuka。另条中以①“鎌刀把”为首的3个义项里，均为植物名的②的3个分项最后即“ハゲイトウ”)，然后又说明“汉语名称：雁来红”。该词典以“雁来红”作“漢名”示例的妙处之一是所在页相邻，第6版中“かんめい【漢名】”和“がんらいこう【雁来紅】”(读ganraikô)各于第650、651页，打开时一右一左(和中国词典不同的是因竖排而偶数、号码小者为右侧)而可同时映入眼帘；更堪玩味的是“葉鶏頭”所冠的“非常美”连释义有“花王”美称的“櫻花”条中都不见，而“雁来紅”释文说明的美好形象又能配得上显得国花都比不过的出众艳丽：“(由秋天雁来时变红而得名)叶鸡头(原文为‘ハゲイトウ’)的汉语名称。”

《现代汉语词典》不收的“雁来红”在《辞海》中有出条：“(Amaranthus tricolor var. splendens)亦称‘老少年’。苋科。一年生草本。近顶上的叶有红、黄、紫等色。秋季开花，花小，簇生于叶腋及茎梢。原产热带亚洲。栽培供观赏。全草入药，有解毒功效；种子可治眼疾。”特

写药效的实用观点和《广辞苑》强调观赏用及外观的偏重美感形成对照,《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葉鷄頭”也只提观赏功能而不见药用。这部辞书释文中“原产亚洲热带地区”、“高1~2米”乃至小花的“浅绿色”,都和《广辞苑》微妙相异而显出**词典释义之不易和多样**。该条的3个古例中为首的“*番匠童(1689)八月‘鸡头花〈略〉叶鸡头”,日语“葉けいとう”中“鷄頭”按通常音读“けいとう”而未呈复合时后接者多有的浊音化,“鸡头花”之由来更叫人感到《广辞苑》第4版还有的叶“形似鸡头”之处被删可惜,而日语中极少用汉字写的“葉鷄頭”这一**趣称大可向汉语“逆输出”**(《日本国语大辞典》释义“将进口货作为加工品反过来向从其进口的国家出口。亦用于指文化和技术”,无例文的该日创词[ぎゃくゆしゅつ/gyakuyushutsu]当为反义词“逆輸入”[ぎゃくゆにゅう/gyakuyunyū]所派生,其首例出处为“*东京朝日新闻一明治三八年(1905)三月二七日”)。“鸡头花”不知是否和“叶鸡冠”等一样是雁来红的汉语别名,从第3例“*日本植物名汇(1884)〈松村任三〉‘ハゲイトウ 雁来红’”则可知,该词和“雁来红”的结合晚于后者条目中4个引例中的前3个。

“*文明本节用集(室町[按:1392—1573]中期)”和“*俳谐·毛吹草(1638)二”都写“雁来红”,“雁”在《现代汉语词典》、《辞海》中作为异体保留于“雁(鴈)”字条头,《广辞苑》、《日本国语大辞典》则以“がん【雁·鴈】”(读gan)的**并列平等地对待旧体**。“雁来红”条目未标汉源而写是“はげいとう(葉鷄頭)这一植物的古名”,在《语源说》中引《大言海》(大槻文彦编,正文4册、索引1册,[东京]富山房1932—1937年刊)的“语自雁飞越时节叶色变红”;释义同“雁来红”的“雁来草”(がんらいそう/ganraisō)是日创词,而唯一古例的文献“*重订本草纲目启蒙(1847)一一·隰草”,其实就和《汉语大词典》中“雁来红”的古籍出处相通——“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四·雁来红》:‘茎叶穗子并与鸡冠同。其叶九月鲜红,望之如花,故名。吴人呼为‘老少年’。一种六月叶红者名‘十样锦’。”该条释义中的“供观赏,亦可食用或供药用”比《辞海》更多实用成分,但2条引证之首的宋代陈允平《唐多令·吴江道上寄郑可大》词句“欲寄相思无好句,聊折赠雁来红”,又可与《日本国语大辞典》第3例的“*山阳诗钞(1833)二·秋日田园‘随分农家还好事 缚篱护得雁来红’”比美。

江户时代后期的儒学家、历史学家、汉诗文学家赖山阳的这2句的头2字,已不见于《现代汉语词典》而仅存于《辞海》的“随分”条目:“①犹随遇。陆游《暮山溪·游三荣龙洞》:‘啸台龙岫,随分有云山。’②犹随便。宋自逊《暮山溪·自述》:‘客来便请,随分家常饭。’③照例;照样。郭应祥《好事近·丁卯元夕》:‘今夜度元宵,随分点些灯火。’”《日本国语大辞典》的“ずいぶん【随分】”(读zuibun)条全无汉源引证,而“□〔名〕安分。守本分”和《汉语大词典》的“随分②”释义相同,该项有唐代李瑞《长门怨》诗句“随分独眠秋殿里,遥闻笑语自天来”等2条引证;均有引证的7项中“③照样;依旧”、“④随便;就便”、“⑤随意;任意”含于《辞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海》，而这几层意思和“①依据本性；按照本分”、“⑥到处；随时”、“⑦谓依例送一份（礼钱或礼品）”，都不合《日本国语大辞典》列举的其它语义——㊦(副词)的①“尽力而为；极力”、②“(程度、正面评价等)相当；极为”、③“(下接否定形)决(非)；必(不)”；㊧(形容动词)的①“好极”、②“糟透”。现代日语中已不见用的汉源词义㊦在此被与汉语脱钩，而和汉语的多种意思基本无关的该词属高频也是背道而驰的表现。

藕断丝连的裂层上也出现了不少“千里语缘一线牵”的拼接、混成、繁衍，如《日本国语大辞典》中和“雁来草”一样未被《广辞苑》采录的“雁来月”(がんらいげつ/ganraigetsu)，是从《礼记·月令》的“仲秋之月鸿雁来”派生出的指阴历8月的日创风雅语。“かんめい【漢名】”条中举的训读同义词“からな”(karana)写“唐名”，《广辞苑》该条的3个义项中①为“中国式的名称”，②为“用唐制官名所称的令制官名。如太政大臣称相国、中纳言称黄门”(日创词“唐制”[とうせい/tôsei]即“中国唐朝的制度。唐朝的律令制”；“太政大臣”[だいじょうだいじん/daijôdaijin]是太政官中的最高官职；“中纳言”[ちゅうなごん/chûnagon]是令外官，为太政官中相当于四等官的次官)，③为“稀罕的名字。别名。诨名”，“雁来月”不妨说是体现了亦见于②的中国、汉语对日本、日语影响的“珍妙异称”(这一说法是由③译文中“稀罕的”之原文“珍しい”[めずらしい/mezurashi]，牵出“珍妙”[ちんみょう/chinmyô]、“异称”[いしょう/ishô]组合的“逆输入改装”，这2个日创词意为“稀奇；奇妙；奇异；古怪”和“别名；别称”)。

“唐名①”用⇔列出的训读反义词“大和名”(やまとな/yamatona)即日式名称、日本名称，“汉名”释义之后用→指示参照其条目的“和名”(わめい/wamei)同是音读日创词，《广辞苑》释义“①事物的日语名称。②特指用日语给动植物起的动植物学上的名称。→学名”。①所附的异读“わみょう”(wamyô)另条说明仅为“⇒わめい”，词头“【和名·倭名】”(第5版为止“倭名”在前)和《日本国语大辞典》一致，后者的该条说明“みょう”为“名”的吴音，“わめい【和名】”①释文也只称通此条的①。《日本国语大辞典》的“汉名”(“かんめい”、“かんみょう”同样各为主、副条)，还强调了《广辞苑》该条未提到的“特指动植物名称”，这一重点本身就体现着“命名”字面所含的对有生命者赋予名称或赋予事物以生命般的名称之意。《辞海》不收的“命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立目为“㊦授予名称：～典礼”，《日本国语大辞典》中作名词的“命名”(めいめい/meimei)的“给人、物等起名字”之意，引汉源“* 该余从考一命名奇诡‘世俗命名，多有取用古人名者。如何尚之，名其子，曰偃，曰求，曰点，此以古贤为名者也’”，本国例文首出于赵翼此著(全43卷，约1790年刊)近百年后的“* 五国对照兵字书(1881)”，其实据《汉语大词典》释义“给予名称；定名”的该条中的古今5例之首，在这位以《七绝·论诗》咏叹“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闻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约5个世纪前，已有宋代周密《齐东野语·玉照堂梅品》率先使用：“花屈辱凡十二条：俗徒攀折……种富家园内；与羸

婢命名。”《现代汉语词典》示例的“~典礼”显现**命名权堪称可久领风骚的超级话语权**，《日本国语大辞典》还放过《汉语大词典》所引的元代刘壘《隐居通议·妖孽之名》、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奇谑二·王沂公生》，而单挑和其例4——平步青《霞外攬屑·里事·观壘桥》同于清代的《命名奇诡》文（平[1832—1896]比赵[1727—1814]几乎晚1个世纪），不妨说象征着古今陆续诞生的大批“和名”也不无借助“汉名”之“古贤”的生命力之处。

《广辞苑》、《日本国语大辞典》中的“漢名”条目，都在同音的“感銘·肝銘”和“簡明”两条之间。《广辞苑》示例的“受到一”和“一地记述”、“一的回答”显示二者常用，而前者的汉源“感铭”已不见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汉语大词典》也只是简单地释义、引证作：“感激而铭记于心。唐孟荣《本事诗·情感》：‘张感铭致谢，释然如旧交。’宋陈师道《答陈先辈书》：‘书问见贻，感铭斯切。’”《日本国语大辞典》对这条名词释义“铭刻在心而不忘。亦指无法忘记的深受感动”，引汉典“*沈括一贺谏院舍入启‘深惟降挹之谦，祇益感铭之宝’”，5条例文之首的“*新令字解（1868）〈荻田啸〉”写“感銘”，其次的“*美术真说（1882）〈费诺罗萨〉”则用“肝銘”，最后的“*我是猫（1905—06）〈夏目漱石〉十”才回归“感銘”；据说明词语由来、词形变化、语义和用法的变迁、与近义词的差异等的语志栏称，在“印象”一词受到普遍使用、见于报刊之前其义一般用“感銘”表达，如impression的译词在《明治英和（日）字典》（1889年）中“感銘”先于“印象”出现，森鸥外在1895年的美术评论中以“印象派”译“アンプレッションニスト”（法语impressionnistes的音译，读anpurreshonisuto），但他1889年曾译作“感銘派”。“命名”的上述日语第2例文献正是《我是猫》（之9）而象征着作者的命名意识，鸥外、漱石这两位明治文豪对“感銘”的**率先试用、坚持使用，或许也有汉语素养深厚而致印象深刻之故**，而例文中均见于翻译的“肝銘”和“感銘”**音同、义通而可谓“联珠妙词”**。对汉源词“感銘”**添加日创词“肝銘”的另类“自力更生”**（借该成语[亦入日语，字同，读“じりきこうせい/jirikikōsei”]，而“更”改作第4声的副词），以自主创意更加生动地展现了汉语的衍生力。

亦敬亦远：日语对汉源词之储存、发挥的保值繁殖和变形、转义的调味创新

《日本国语大辞典》的“簡明”条目（作形容动词），有汉源“*容斋随笔‘解释经旨，贵于简明，惟孟子独然’”，《辞海》“简明”条的引证所不同处仅是多了作者、篇名和书名号——“洪迈《容斋随笔·解释经旨》：‘解释经旨，贵于简明，惟《孟子》独然。’”《日本国语大辞典》在释文中列举《广辞苑》亦无专条的成语“簡單明瞭”（かんたんめいりょう/kantanmeiryō），《现代汉语词典》、《辞海》中“简明”条的示例“简明扼要”却未进入日语。“扼要”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扼”领头的5个多字条目之一，兼作“扼”字义项②“把守；控制”示例的“扼守”、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扼制”也不见于《广辞苑》;《日本国语大辞典》有未引汉源的“扼守”(やくしゆ /yakushu)条,作名词解释为“据守一处,防敌攻击”,本国文献仅“*经国美谈(1883—84)〈矢野龙溪〉前·二〇”的孤证而似昙花一现,《现代汉语词典》的“扼守”释文“**扠**把守(险要的地方):~险关”,及《辞海》的“扼守海峡水道作战”长条则更强调险要、紧迫,从《汉语大词典》的引证还可知源于清代薛福成《筹洋刍议·敌情》:“越南人心既固,自可扼守城隘,以绝其粮。”反之,2部日本词典都收的有“扼杀”(やくさつ /yakusatsu)和“扼腕”(やくわん /yakuwan),由这两个词属《现代汉语词典》“**扠**用力掐住”而可推论,日语对汉语似乎往往是知其一而不取其二,取其一而不取其二。

《辞海》的“扼杀”条目采取单项双义形式:“掐死。《晋书·河间王颙传》:‘南阳王模(司马模)遣将梁臣于新安雍谷车上扼杀之。’亦比喻压制、摧残。如:扼杀新生事物。”《现代汉语词典》则为“**扠****扠**掐住脖子弄死。**扠**比喻压制、摧残使不能存在和发展:~新生事物”,《广辞苑》的“扼杀”释义“用手掐住脖子杀死”可谓**择义吸收**的“说一(①)不二(②)”。无示汉源的《日本国语大辞典》还在同上的释义后加上不另分项的“亦称压制使不能活动”,3条例文之首是“*国民百科新语辞典(1934)〈新居格、木村毅〉‘ヤクサツ 扼杀(警)谓用手腕扼住人的咽喉部加以杀害’”(按:词头4字母即“やくさつ”的片假名),最后是“*日本的思想(1961)〈丸山真男〉‘对于向及至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徒广泛进行的焚书、没收财产、驱逐等极为露骨的文化扼杀’”,力挺反对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1月19日签订)的群众运动的这位政治学家、思想史家,在此语中展现了**借用汉语词表达政治思想的日语传统**,而《汉语大词典》的3条引证在同《辞海》例(唯未说明“模”指司马模)的首条之后,是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四》的“既不得药,不能不产,以致子遭扼杀,受诸痛苦,我亦见逼而就缢”,接着就跳到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二》的“如果中国学者有了发明创造,他们不是攫为己有,就是肆意地诽谤和扼杀”。《地质之光》和《哥德巴赫猜想》是发表于1977年10月和翌年1月的报告文学,以此作指迫害的首例则晚于日本十多年,但至1950年代的汉语出版物里存在相应用例可能性理应不小。这部中国最大的语文词典在文献未标年份这点上留下了和《日本国语大辞典》初版相同的遗憾,而《日本国语大词典》第2版的改进使战后“政热”期在日本出现“扼杀”新用法成为研究材料。

当今日本“扼杀”多限于司法用语、命案报道等而和常用其喻意的汉语相反,联系日语“扼”读吴音“やく /yaku”而非异体字“搯”亦读的汉音“あく /aku”,还可联想似乎**象征着回避“恶”(あく /aku)的味道**。日语对汉语的吸纳和翻制常见**辅助性的或排除性的两种“调味”**,一是**加调料而使之可口的“调(tiáo)味”**(《辞海》而无《现代汉语词典》收的该动词在日语中作名词“调味”[ちょうみ /chōmi],《日本国语大辞典》中指给食物添味调料的①引汉源——“*《鹑冠子·

泰鸿》：‘调味章色、正声，以定天地人事，三者毕此矣’，和《汉语大词典》唯一义项的古今3例之首仅差“调味”和“章色”之间有无顿号），二是改真髓而变其本质的“调（diào）味”（这一借字异读的“调 [tiáo] 皮调 [diào] 包”说法可由日语多放“佐料”而变味为佐证，“调味”就有“②在诗歌等中调制韵味。亦指其情趣”）。

有趣的是汉语中同音的“恶意”、“遏抑”交汇于“扼”的字、词，而日语中为数不多的带“扼”词语既极少指遏抑又鲜有恶意。“遏抑”从《现代汉语词典》释文就可知和同有2条示例的“遏制”一样常用：“**遏**压制；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 | 百感交集，难以～。”“遏”领头的5个多字条目中近义的“遏止”（“**遏**阻止：洪水滚滚，不可～”）也是日语所无，而《日本国语大辞典》有《广辞苑》不录的“やくし【扼止】”（读 yakushi），连《现代汉语词典》都不见而似为日创的该词意即遏止，2条例文之先为“*哲学字汇（1881）‘Restraint 阻碍；束缚；禁止；遏止；阻拦’”（原文“阻碍、拘束、禁制、约止、栏阻”中的该词“约止”音同“扼止”。又，英语名词 restraint 汉译有“抑制；压制；压抑；克制；制止；限制；管束；约束”等），“*作战要务令（1939）二·三二九‘又得以寡兵扼止众敌’”之后便无用例。

“遏抑”释义“压制；抑制”的组合“压抑”在《广辞苑》、《日本国语大辞典》都有立目（あつよく /atsuyoku），前者无示例而释文仅为“强行压制”；后者释义“〔名〕强行压制。抑制人的行动或欲望而使其不自由”，引证“*李商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其详缓柔润，压抑趋儒，如以一国，买人一笑，如以万生换人一朝’”，3条例文出处依次为“*西国立志编（1870—71）〈中村正直译〉一·一”、“*明六杂志—二七号（1875）民选议院反常论（阪谷素）”、“*日本开化小史（1877—82）〈田口卯吉〉五·九”。《现代汉语词典》对“压抑”释作“**遏**对感情、力量等加以限制，使不能充分流露或发挥”，示例“～感 | ～不住内心的激动”显现着使用的频度不低、范围不窄；《辞海》的该条目却是无示例、引证的单意：“亦译‘潜抑’。防御机制之一。个体将不为自我所能接受的欲望、观念、冲动等压制在无意识中，使其不出现。通过压抑，暂时避免了本我与自我、超我的冲突，但是那些被压抑的无意识仍无时无刻地寻找出口，以梦、口误、笔误等伪装的形式出现。”指示参见的“防御机制”条目写明是弗洛伊德最初提出的精神分析学派用语，而“压抑”仅对应亦称“自我防御机制”、“心理防御机制”的这一概念，就像晚于《辞海》新版2年刊行的《现代汉语词典》新版的《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之数量膨胀，不无汉语在中国的“国际接轨”期步入日语百余年来走过的西化道路的象征性意味。

《汉语大词典》则有“①沉着；沉郁。②压低；抑制”双义，①唯一引证的李商隐文大致同《日本国语大辞典》（2处出入为篇名中“容州”之前有“唐”，“一国”之后无逗号），②的2条例文先是宋代梅尧臣《伤骥》诗句“驰骋心独存，压抑头不起”，然后比“扼杀”举例更大幅度地跨时代而又落到徐迟的作品——“《牡丹》七：‘那压抑在她内心多少年的痛苦，第一次被唤醒。’”“四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人帮”中的军师张春桥谬言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之间的百年间是空白，而造成文化空白的“10年浩劫”结束10年后首发的《汉语大词典》中这2条相隔900多年，恐怕还有语言的采录积蓄及探究精神都受重创(严重创伤)而重创(重新创立)不易之故，对徐迟作品的钟爱大概还因看重他曾以上引的2篇报告文学预报了“科学的春天”(郭沫若1978年3月31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之题)，而1965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牡丹》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见天日也是遭扼杀、压抑的结果。

上述2部日本词典中“压抑”条列举的同义词“抑压”(よくあつ/yokuatsu)，《广辞苑》的释文显示远比“压抑”泛用、多义：“①强行抑制。硬压。‘一自由’②【心】(德语 Verdrängung)把由语言、形象、感情、自觉行动(原文为‘随意運動’)等要现于意识的个体的欲望(力比多)再次压回到无意识中。防御机制之一。弗洛伊德的用语。”《日本国语大辞典》中同作名词的条目①为“强行压制。加以抑制压迫”，标明汉源“*新唐书—李德裕传‘美官要选，悉引其党为之，否则抑压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3条例文之首“*文明论之概略(1875)〈福泽谕吉〉一·三”和“压抑”的第2条同年，其次的“*土(1910)〈长塚节〉一五”远远晚于“压抑”的第3条，最后的“*啾啾吟(1953)〈松本清张〉六‘政府对该政党加以抑压’”，年代、内容都可说明**政治比重加大的当代社会生活需要所致相对高频**。首例“畜(ただ)に上より抑压するの類に非ずして”(不啻上压下之类)汉文风格浓重，但用汉源词“压抑”反转成这一日创词就体现了作者10年后呼吁的“脱(离)亚(洲)”。②作“心理学中谓自我的要求被外部条件所阻止”而对应《辞海》的“压抑”释义，但同样无例文而不知何时问世及日、汉孰先孰后。不过分别用“抑压”和“压抑”不论当初有相互影响与否，都能凸现**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加速以自创“国货”或舶来“洋货”取代汉词、疏远汉源**。

然而对照《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均不见“抑压”，又不得不承认**日语将汉语中褪色的部分涂上重彩、加以重用可谓青出于蓝**。《现代汉语词典》的“青出于蓝”条引《荀子·劝学》云“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并解说：“蓝色从蓼蓝提炼而成，但是颜色比蓼蓝更深。后来用‘青出于蓝’比喻学生胜过老师，后人胜过前人。”这一成语亦进入日语作“青は藍より出でて藍より青し”(“青”、“藍”分别训读为“あお/ao”、“あい/ai”，接2处“藍”后的助词“より”依次表示来自[文言]、较之，“出でて”[idete]是古语动词“出ず”[izu]的连用形，“青し”[aoshi]是形容词“青い”[aoi]的文言)，《广辞苑》中“青”字条内的该分项还列举熟语“出藍の誉れ”(出藍之誉)、对句“氷は水より出でて水より寒し”(冰出于水而寒于水)。“藍”为音读的“出藍”(しゅつらん/shutsuran)条目同作比喻弟子胜过师(“青は藍より出でて藍より青し”条作“先生”[せんせい/sensei]，“出藍の誉れ”条作“師匠”[ししょう/shishō]即师傅)，有趣的是这条释义中的“藍から採った青色”(从蓝提炼的青色。助词“から”指来自)，和上条的“青色の染料は

藍の葉から取る”(青色の染料取自藍草叶)动词用汉字不同,“採る・取る”的基本形都训读“とる /toru”(“採った”是“採る”的完了形),这和意同汉语的同义形容词“青い・蒼い・碧い・翠い”训读音为“あおい /aoi”一样,是**日语字、词发音多样而成的独特“语环”**,而该词典中近义词条内对同一内容的行为分别采取“採”、“取”的写法,似乎象征着**取自汉籍之“取”而又要自取非原文之词的“异化”努力**。

《日本国语大辞典》的“青は藍より出でて藍より青し”专条,引证同一文献出典“学不可以已,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比略有出入的《辞海》所引“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还详细。《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在“取之于蓝”之后有无逗号的差异说明古文断句难,由此可对《日本国语大辞典》所引“如以一国,买人一笑,如以万生换人一朝”等不加苛求,尽管成为这条“压抑”的唐代用例中头1个标点既未按**汉语讲究形式对称的金科玉律**(这4字本身就是“金·玉”和“科·律”2对相关字的组合),又不像后半部分8字连成一体才构成完整的意思。《日本国语大辞典》在“氷は水より出でて水より寒し”条中引《荀子》同篇的该段,作“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青出之藍”和“青は藍より出でて藍より青し”中“取之于藍”的出入,已超出“而青于藍”、“而寒于水”之前有标点的问题。固然还不妨以古籍版本繁多来为同一词典的相关条目引证同一知名例文的不统一之怪辩护,而体现**不刻意追求对称、统一的日语特质**之另1例,是《广辞苑》的“氷は水より出でて水よりも寒し”条目。第2个“水より”之后比《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该条及本词典“青は藍より出でて藍より青し”所示对句,多出强调程度的“も”;引证出典的译文“氷は水之を為(つく)りて水よりも寒(つめ)たし”,其中同汉语意的“之”训读“これ”(kore),用括号中的注音说明“為りて”是动词“作る・造る”(つくる /tsukuru)的文言,“寒たし”是指“温度低而感觉冷”(《广辞苑》释义)的形容词“つめたい”(即冷,写“冷たい”,读 tsumetai)的古语终止形,日语中指“气温低而皮肤受到(不快的)刺激”(同上)的形容词为“寒い”(さむい /samui),而这2部日本词典中“氷は水より出でて水より(も)寒し”的“寒”都读“さむ /samu”。

《辞海》中“冰”字条①在释义“水在0℃或0℃以下凝结成的固体”后,有含此名言的示例、引证——“如:河里结冰了。《荀子·劝学》:‘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和《现代汉语词典》一样无立目就不如连专条词头中“寒”的读法都尊重原文的日本辞书,**日语对汉语的出蓝还见于**《日本国语大辞典》所收的**衍生熟语**——“藍より出でて藍より青し(濃し [こし /koshi, 指浓的文言形容词])”(出于蓝而青[浓]于蓝)、“藍より濃し”(浓于蓝),二者的最早例出自“*筑波问答(约于1357—72 [按:原文为‘1357—72 頃’,‘頃’<ころ /koro, 亦写‘比’]即时间的‘约’,单看此处似可理解为‘1357—约1372’,因为‘しばせん【司馬遷】’<读 Shibasen)条中生卒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年作‘(BC一四五頃~BC八六頃)’(约公元前145—约公元前86),可见始、终的两头均不确定时《凡例》无明文规定的规范标记为都加‘頃’,但‘つくばもんど【筑波问答】’(读tsukubamondô)条说明该书‘延文二~応安五年(一三五七~七二)頃成立’,由此可知‘1357—72頃’是指‘约1357—约1372’,而本文以‘约于1357—72’的方式表示。又,上引‘興起’条内‘*三国传记[约于1407—46?]四·一五’,原文‘1407—46頃か’之‘か’[读ka]即意为疑问的助词”、“*纪闻集(12世纪下半叶)”。不见于2部中国词典的“出藍”在《日本国语大辞典》条目中有汉源,说明由来的《荀子·劝学》云“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和上述另2条的引文有词语或标点的出入,而引证为“*苏轼一与朱康叔书‘天觉出藍之作,本以为公家宝,而公乃轻以与人’”。语志介绍该成语在中国唐代已有作“取”或“出”的2种版本(据王家谦《荀子集解》),日本则早有源为宪编《世俗谚文》的“青取之藍而青于藍”,但中世以后如《筑波问答》的“水より出て水より寒し”(“出て”[でて/dete]是动词“出る”[でる/deru]的连用形),“出”似成为一般用法。

“出藍”和训读“誉れ”(ほまれ/homare)组合的“出藍の誉れ”在该词典中有汉源:“*中州集‘密公字子瑜,与陵之孙,越王之长子。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也。少日,学诗于朱巨观,学书于任君谔,遂有出藍之誉’”。“出藍之誉”在中国未成熟语或许和这段记述鲜为人知有关,而日语用来指“弟子胜于师的评价、名声”(释义)的2条例文——“*法窗夜话(1916)〈穗积陈重〉六八”、“*吉田健一(1954)〈河上彻太郎〉”,晚于“出藍”条的另一分项“出藍の青(せい)”(括号中的平假名为音读sei),形容弟子胜于师的此语无汉源而由“*福翁百话(1897)〈福泽谕吉〉八八”首创,从其孤例不见后续及《广辞苑》不收该词似乎可以推论,明治后期间世的“出藍之青”在大正(1912—1926)初期被“出藍の誉れ”取代,“出藍の誉れ”经其后的昭和而至平成(1989—)百年不衰,也如该词典“出藍”释义首句所言是“后出现的事物反而胜过导致其出现的事物”,而下句“用以指弟子超过其师等”又能适用于**对被埋没的汉语词的开掘**。

准汉源或半汉源的日创说法“出藍の青”催生**出汉源熟语**“出藍の誉れ”,后者的升级还可对照“青は藍より出でて藍より青し”的变迁。《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该条语志(1)称此语本不限于用在师弟之间,如《日莲遗文》、《十训抄》中有用于父子间之例;《应永本论语注释·雍也第六》的“将千骑记为二千骑,五千骑写作一万骑,可谓青出于藍而胜于藍”,则是形容夸大数量;江户时代林道春在《童观抄》中标明“荀子云”并解说为师弟关系之意后,出典及其语义逐渐得到广泛接受。(2)举《妙贞问答·中》的“藍は藍より出て藍よりも青く”(藍出于藍而青于藍。似即上述“蓝色从蓼藍提炼而成,但是颜色比蓼藍更深”)为例,指出室町时代末期已有“藍は藍より”这一说法。这2条考证都显示了和“出藍の青”一样**先有或自有日创语义或说法**,而那位儒学家、幕府儒官林家之祖(本名林罗山)指明出处后**汉源正宗成为主流**,不妨解释为**现代之**

前日语对汉语尚有作为名牌崇尚的倾向之故。

上述(1)中“师弟”当然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师弟】²”——“〈书〉**名**老师和学生(弟:弟子)”,“【师弟】¹”的2个义项则都是日语所没有——“**名**^①称同从一个师傅或老师学习而从师的时间在自己之后的男子。^②称师傅或老师的儿子或父亲的男弟子中年龄比自己小的人。”可相近对应^①的日语“後輩”(こうはい /kôhai)与之不同的是不分性别,在《现代汉语词典》的“后辈”双义中也只是大致接近其^②——“**名**^①后一代或后几代的人,指子孙。^②同行中年轻的或资历浅的人。”《日本国语大辞典》中“後輩”除最后的“^③在后方的人们”外都有汉源,“^①后来出生的人。后生者。亦指学问、技艺、修炼等方面的后来者”,引证“*蔡邕—陈政要七事疏‘又前至得拜,后辈被遗’”;“^②称同一学校、地区、单位等中的低年级生或后来者”,引证“*孟浩然—陪卢明府泛舟回作诗‘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2条例文之首出自“*行人(1912—13)〈夏日漱石〉归来后·一三”,再次证明大正时代文坛、知识界推出的新词仍有一定的汉源。《辞海》中“后辈”的“^①晚辈;年纪较轻、资历较浅的人”引证上述孟诗(题内“回”和“作”之间有“岷山”),“^②犹后裔。后代”则只附示例“如:他家后辈有出息”。《汉语大词典》的“后辈”条目中“^①后到的人”同引上述蔡文;“^②指同道中年轻或资历浅的人”的3条古例无上述孟诗,而以“唐韩愈《答刘正夫书》:‘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为首;“^③后代子孙”仅有“袁鹰《未来之歌·献给英雄的长辈》:‘少先队员的心,你们的后辈们的心,总是同你们在一起!’”和《日本国语大辞典》^①的“后生”不无相通的此义因未提示渊源,而显得在《现代汉语词典》列为义项^①像是现代新意后来居上。

“後輩”^①所举同义词“後進”(こうしん /kôshin)也是汉源词,《日本国语大辞典》该词条的^①即引证“*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其释义“沿着前面的人所走的道路行进。亦指在自己之后在学问、技艺、职务等方面走同一条道路的人。后辈”,相当于《辞海》中“后进^①”的“犹后辈。亦指学识或资历较浅的人”,该条示例和《现代汉语词典》的^①“**名**学识或资历较浅的人”都为“提携后进”,引证则为《后汉书·孔融传》的“喜诱益后进”(释义除起首的“犹”字全同《辞海》的《汉语大词典》同条^①,古例和《日本国语大辞典》的出入仅是2处“礼乐”后有逗号,“后进”前为分号)。《辞海》的“^②进步较慢的;水平较低的。亦指进步较慢、水平较低的人或集体。如:见后进就帮”,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按词性分为不同义项:“^②**形**属性词。进步比较慢、水平比较低的:~班组。^③**名**指进步比较慢、水平较低的人或集体:学先进,帮~。”与之对应的《汉语大词典》^{②③}的用例都出自中共建政后的文字,由^③可知《辞海》^②的例文见于《工人歌谣选·四见歌》的“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汉语大词典》多出的义项是“^④谓行进在后”、“^⑤多排房屋后面的一排”,^④引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云“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九年”,而比起《日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本国语大辞典》中“②事物的程度或进步程度落后”的例文出处——“*抒情诗(1897)〈国木田独步〉序”，汉语的上述用例足足晚了半个多世纪。《日本国语大辞典》的另一义项是同为名词的“③交通工具等向后行进。向后转进的措施”，所举的同义词“後退”(こうたい/kôtai)、“背進”(はいしん/haishin)分别是汉源和日创，后者据专条引例初出于“*追忆记(1900—01)〈德富芦花〉六·一八”，旋即转用作指撤退并讽刺性地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此掩饰被动之意一度进入汉语。有别于“背進”对汉语先行的“後進③”之独行始于“*春城(1952)〈阿川弘之〉二·一二”，1950年代两国分别出现谓向后行进和行进在后的该词创例，可谓**和不谋而合相反并较之更多的“不谋而逆”**。

“後輩”的反义词“先輩”(せんぱい/senpai)在《日本国语大辞典》中释义为：“①学问、技艺、经验、年龄、地位等在自己之上的人。②前任者。③在同一学校先入学、毕业的人。亦指在工作单位等先进来的人。”①引证“*诗经—小雅·采薇‘采薇采薇，〈笺〉今薇生矣，先辈可以行也’”，和②同为日创的③首条例文出自“*暑中休暇(1892)〈严谷小波〉”，20年后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中出现相对的“後輩”也符合“先、后”顺序。《广辞苑》浑然一体地作“先出生或学艺、地位等方面走在前面的人。亦指先入同一学校、工作单位等的人”，从示例“以一自居”、“一演员”也可知频度较高、用法不少。《现代汉语词典》中“先辈”亦指令人钦佩、值得学习的故人而与日语异大于同，《辞海》未收的该条在《汉语大词典》中义项多达5个，“①依次排列于前者”的引证与《日本国语大辞典》相异而为：“《诗·小雅·采薇》‘薇亦作止’汉郑玄笺：‘西伯将遣戍役，先与之以采薇之时，今薇生矣，先辈可以行也。’”“②对前辈的尊称”的3条之末是现代用例——巴金《在一九七九年评选获奖作品大会上的讲话》中的“我们的先辈一代一代地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学遗产”(文献标题未写全而显得不详、不通的会议名称，是“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1980年3月25日于北京举行]。《日本国语大辞典》附卷中《出典一览》详列所举文献的基本信息，《汉语大词典》在这点上也显得粗糙)，首例则为《三国志·吴志·阚泽传》的“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③唐代同时考中进士的人相互敬称先辈”和“④对文人的敬称”(各有3条、2条的例文之首分别取于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金朝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一)，**随旧制度、旧习俗废止后仍将该词作敬称的传统留到现代、传至东瀛。**

日语在自创“先輩”、“後輩”新意的同时扬弃了汉语的“前辈”、“晚辈”，《广辞苑》不收的这对反义词在《日本国语大辞典》单有“ぜんぱい【前辈】”(读zenpai)，仅说明“同‘せんぱい(先輩)’”而似乎对应其所有义项，但7条例文到“先輩③”出现的20年前的“*和(日)英语林集成(再版)(1872)”即止，首例“*济北集(约于1346?)九·答宏知客”晚于“先輩”首例“*本朝无题诗(约于1162—64)四·春三题·序(藤原周光)”，不妨说引证“*孔融—

与曹操论盛孝章书‘今之少年，喜谤前辈’的该词比“先輩”后进、先出。《现代汉语词典》的“前辈”与日语该词及汉语“先輩”都不同：“**名**①前一代或前几代的人，也指祖先。②同行中年长或资历深的人。”《辞海》的“前辈”仅为“年长或资历较高的一辈。如：老前辈；革命前辈”，所引孔融《论盛孝章书》（无《日本国语大辞典》的“与曹操”）的“今之少年，喜谤前辈”，也是《汉语大词典》的“前辈**①**”（释义“称年辈长、资历深的人”）的4条例文之首。“**②**唐代称进士及第者为前辈”、“**③**为唐代进士间互表尊重的称呼”、“**④**清代翰林称先已三科入院者为前辈”（引证例略），在现代汉语中随现象、背景消失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能解释日语里的“早退”。

和“前辈”对举的“晚辈”连《日本国语大辞典》都未进，颇能体现日语不在意完备成对、偏爱与汉语作对的特质。《现代汉语词典》作“**名**辈分低的人；后辈”的该词在《辞海》释文为：“后生；后辈。刘克庄《内翰洪公舜俞哀诗》：‘内庭唤作真学士，晚辈推为老舍人。’”仅释义“后辈”的《汉语大词典》中有3条例文，在苏轼《过广爱寺见三学演师》诗之三、《西游记》第58回所出的之后，柳青《创业史》第1部第3章的“他用长者的身分教训晚辈”引出和汉语的另一差异。“长者”释文为“**名**①年纪大、辈分高的人。②年高有德的人”，《辞海》释义“①年纪大、辈分高的人。②指显贵者。③有德行者。多指性情谨厚的人”（分别引证《孟子·告子下》、《史记·陈丞相世家》、《史记·项羽本纪》文），《日本国语大辞典》的“ちょうじゃ【長者】”（读 chōja）也有相应的4条——“①德高者。亦指稳重的人”、“②有钱人。富豪。财主”、“⑤年长者。辈分高的人。地位高的人”和“⑥（从⑤引申用作共同体、艺技之道等的最高地位称号）首长。长老。主宰者。头领”，但11个义项中仅亦作“ちょうしゃ”（chōsha）的①⑤引证汉源（“*史记·项羽本纪‘素信谨，称为长者’”[《辞海》③的引文前有‘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礼记·曲礼上‘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①前条头的“【名】（梵语 śreṣṭhin 的译词。团体、行会之长的富豪，或地位、德行高的年长者之意）”，就说明这个单词除了有异读的少数2条外都非汉源。现代日语的“長者”常用于“億万—”（亿万富翁。“亿万”读“おくまん / okuman”）、“一番付”（富豪排榜。“番付”读“ばんづけ / banzuke”），因而“用长者的身分教训晚辈”以日语常识无法凭字面正确理解（另一因素是日语“教训”[きょうくん / kyōkun] 虽是汉源词[《日本国语大辞典》引证《礼记·曲礼上》的“教训正俗，非礼不备”]，但仅是指意为从错误或失败中所得的见识的名词，而不像汉语还作为动词指教育训诫）。

《现代汉语词典》的“长（長）（zhǎng）”字条**③**释义“年高、位高或辈分高”，而示例的“长者；长官；长辈”中日语唯独没有“长辈”。《辞海》不立目的该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条件作“**名**辈分高的人”，释义“辈分大的人”的《汉语大词典》之2条引证又有助于解释日语不“进口”。先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回的“四十五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寿’……若說那‘得年’、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吴沃尧作的这部长篇问世(1903—1910年陆续发表)的**清末汉语对日影响已弱到强弩之末都称不上**；再是巴金《秋》49的“四爸、五爸，你们不要以为做小辈的就害怕长辈”，该长篇(《激流三部曲》之三，1940年刊)的这句中“小辈”在日语里没有此意。“小辈”在《汉语大词典》释为“①辈分小的人。与‘长辈’对称。②低贱的人”，各有2条、3条的例文之首分别是《醒世姻缘传》第22回、宋代吴自牧《梦粱录·酒肆》，而《日本国语大辞典》的“しょうはい【小輩】”(读shōhai)释义“身份低贱者。下人。转指微不足道的人”(《广辞苑》同条中本义和转义分为2项)，2条例文之首“*太閤记(1625)五·秀吉卿与柴田修理亮胜家及矛盾起之事”，未标汉源而不知是否意味着上述宋人用例历来无影响或本次被疏漏。

《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立条的“湖光山色”亦出自此公的《梦粱录·历代人物》，后者还引原文“杭城湖光山色之秀，钟为人物，所以清奇杰特，为天下冠”。2部辞书都不单出条的“湖光”、“山色”指“湖上的风光，山上的景色”(《辞海》该成语条释义)，二者合成形容的“湖、山相映的秀丽景色”(同上)在日本亦多见，但**日本人喜闻乐道**(仿未入日语的“喜闻乐见”)的**大量汉源成语中却缺这条**。《日本国语大辞典》有不见于《广辞苑》的“ここう【湖光】”(读kokō)条目，引证汉源“*雀护一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长沙东湖‘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2条例文出处之先为较晚的“*美欧周游实录(1877)〈久米邦武〉一·六”，对这一名词的释义“湖的水面反射太阳光线而发光。亦指其反光”颇为科学，然而该物理现象之“光”对照古今汉语侧重的“风光”就显得杀风景。“风光”、“风景”的字面及字序也可体现日语没有的“风花雪月”中“风”领风骚的审美意识，《日本国语大辞典》的“ふうこう【風光】”(读fūkō)义项皆为汉源——“①自然的美景。景色。风景”引证“*骆宾王一从军中行路难‘三春边地风光少，五月泸中瘴疠多’”，“②样子。亦指(记忆中或心中浮现的)面貌、风貌”引证“*元稹一寄旧诗与薛涛诗‘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②无例文及在《广辞苑》该条中不成义项说明在日本未得受用，更谈不上《现代汉语词典》中“【风光】¹”的“风光；景象”之后的“【风光】²”——“〈口>光彩②；体面②”(“光彩[光采]②”为“光荣”；“体面②”为“[相貌或样子]好看；美丽”)。

《广辞苑》“風光”条内的唯一分项“一明媚”(めいび/meibi)释义“山水风景秀丽”，在《日本国语大辞典》的“【風光明媚】〔名〕〔形动〕”条中无汉源，释义“风景好。山、川景色美。亦指其貌”，2条例文始于“*从江户到东京(1921)〈矢田插云〉四·四”。该词典的“【明媚】〔名〕〔形动〕”条释义“山水景色清丽。亦指其貌”，有汉源“*鲍照一芙蓉赋‘测流池之光洁，烁彤辉之明媚’”，而释义“鲜妍悦目”的《辞海》的2条引证之首就是鲍赋的“烁彤辉之明媚，粲雕霞之繁悦”，其次的李成《山水诀》云“春山明媚，夏木繁隆”和上例同有“繁”，而用与《日

本国語大辞典の“彫”相異の“彤”の上例又为《汉语大词典》所引，不过是“①鲜明可爱”的3个古今用例之头条。“②明亮美好”仅王西彦《母性》的“作母亲的有着一双明媚动人的眼睛”这条现代例文（这篇散文写于1942年而在当代即中共建政之前），日语没有的这个义项也见于《现代汉语词典》的同条：“**彤**①（景物）鲜明可爱：春光～|河山～。②（眼睛）明亮动人。”从②还能想到“明媚”和字相重、音相近的“明眸”之内在相关。

《现代汉语词典》中“明眸”和“明眸皓齿”分别立目（“皓齿”则无专条），仅收“明眸皓齿”的《辞海》举这4字组合的古例为杜甫《哀江头》诗：“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2条引证中居前的是两词成对的曹植《洛神赋》文——“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辅靨承权。”《汉语大词典》中释义“美目善于顾盼传情”的“明眸善睐”条亦首选此，但末句“靨辅承权”与之字序有异。直到第5版都作“靨辅”的《辞海》在迎来新纪元后的首次改版中颠倒为“辅靨”，若非词条移动位置（改旧例而不论字数一律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时的人为错误或电脑作怪，则当有足以证明近1800年前的原文即如此的重大突破性发现方能说得过去。《辞海》中“靨”领头的唯一多字条目为“靨辅”，意为“双颊上的笑窝”的该词引证《楚辞·大招》的“靨辅奇牙，宜笑嚙只”；《汉语大词典》的该条注明亦作“靨辅”，释义“颊边微窝。俗称酒窝”并有引证：“《文选·曹植〈洛神赋〉》：‘明眸善睐，靨辅承权。’刘良注：‘言靨文之生辅承其颊。’”三国时代魏国文人的这一名篇在中、日的版本都多作“靨辅承权”，日语中没有“靨辅”（通常音读作‘ようほ /yôho’）一词，但指酒窝的“靨”（えくぼ /ekubo）即同音的“笑窝”之意，这和《现代汉语词典》中“靨〔靨〕”字条释文“酒窝：酒～|笑～”的最后一示例吻合，而《日本国語大辞典》该条语源说的2条之（2）就是“‘靨辅’的异读 Wek-Ho”，尾崎雄二郎、都留春雄、西冈弘、山田胜美、山田俊雄编《角川大辞源》〔东京〕角川书店1992年刊）亦称“えくぼ”一説为“靨辅”的讹音，并在以“えくぼ”释义的“‘靨辅’条引证《淮（南子）·说林》的“靨辅在颊则好”。日语也引进了显示两国同以明亮的眼睛、洁白的牙齿为女子美貌的价值观的该4字成语，《日本国語大辞典》所引汉源正是上述杜诗（其中“污”作“汙”）；《广辞苑》还各有专条的“明眸”（めいぼう /meibô）、“皓齿”（こうし /kôshi）发音都相当接近汉语，而**积极照搬汉语妙词美言的日语**却奇怪地放过“湖光山色”并自造、自消了不灵光的“湖光”。

《日本国語大辞典》的“さんしょく【山色】”（读 sanshoku）条，引证“*张说一岳州观竞度诗‘炫装山色变 急棹水华浮’”，5条例文始于“*扶桑集（约于995—999）九·北堂汉书咏史得路温舒（菅原文时）‘汉朝舟泛心中水，山色官寻眼外云’”。**上一个西历千禧年前后各数世纪之间日本人爱写的汉诗不乏立意不俗、水准不低的佳作**，这联的“心中水”与“眼外云”之对在字面、平仄、意境上就都够工整，而“山色”对“汉朝”似乎又预示着日语中注定和“湖光”无缘。第2例的文献“*正法眼藏（1231—53）谿声山色”则像是日创成语之源。《广辞苑》中

中、日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语沟·语通”、“语缘·语环”诸相纵论(1)(夏)

释义“山的颜色。山的景色”的“山色”条之唯一示例即“溪声一”，“けいせい【溪声·谿声】”(读 keisei) 条则以“一山色”为唯一示例。《日本国语大辞典》中没有这4字的成语专条，而“溪声·谿声”条的3例之首正是“*再昌草一文龟二年(1502)五月二日‘露气风光流几上，溪声山色泼栏干’”，引证汉源则为“*赵嘏一发刻中诗‘树色老依官舍晚，溪声凉傍客衣秋’”。《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均不收的“溪声”在《汉语大词典》有条释作“溪涧的流水声”，4条例文之首为唐代陈润《宿北乐馆》诗句“庭木萧萧落叶时，溪声雨声听不辨”，其次的宋代陆游《登紫翠楼》诗句“水落溪声壮，天寒山色奇”出现了“溪声·山色”之对，但该词典的“山色”(释义“山的景色”)的3条例文中仅第2条和上述日创汉诗有关——宋代欧阳修《朝中措·平山堂》词句“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恰巧带那首亦用“风光”之作中的“山色”、“栏干”(らんかん / rankan)。日语有“湖光·山色”而无“湖光山色”及将“溪声·山色”组成“溪声山色”，所含的启示在于日语对汉语还会知其二而不合一，不知其一而创其二。

注释

- 1)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日文)2001年版(依据[伦敦]吉尼斯世界纪录公司2000年刊 *GUINNESS WORLD RECORDS 2001*)，田中孝显审订，[东京]きこ(Kiko)书房2001年1月31日刊，第113页。
- 2) 其中非洲680种、亚洲590种、大洋洲420种、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420种、欧洲210种、北美洲75种。“维基自由百科事典”日文版《圣经翻译》条，2013年8月9日阅览确认(以下引用网络资料同)。
- 3)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日文)1999年版(依据1998年刊 *THE GUINNESS BOOK OF RECORDS* [按：与注1、3所引同一系列书刊的英文名相异]1999)，夏目大译，田中孝显审订，きこ书房1999年1月1日刊，第180页。本文作者对此质疑，也因第181页的1条记述闻所未闻——1996年中国的2235种报纸中，最大的是有800万读者的《四川日报》(有趣的是2235种这一数目，又极接近上述2000年版所称《圣经》译本的2233种)。
- 4)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日文)2000年版(依据1999年刊英文版 *GUINNESS WORLD RECORDS 2000*)，田中孝显审订，きこ书房2000年1月1日刊，第134页。
- 5) “维基自由百科事典”日文版《圣经》条。
- 6) 同上。
- 7) 此说的较新版本之一，是“经济观察网”2010年8月20日载陈平平《最畅销图书排名 毛主席语录居首》(选译美国新闻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文)，称《圣经》是全球销量最大的书籍，《毛主席语录》紧随其后，《新华字典》排名第三。按：“史上十五大畅销书”排榜外的《圣经》刊行量高于《毛主席语录》，故标题和文中的首位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新华字典》因中国人多、对语文字书需求高而地位突出。
- 8) 胡庄子《话说〈毛主席语录〉》，[长沙]《书屋》月刊2005年第4期。
- 9) 阎志峰《“四个伟大”何以风行全国五年》，[沈阳]《党史纵横》月刊2012年第9期。
- 10) 小松达也《口译的英语、日语》，[东京]文艺春秋社2003年版，第15、39页。
- 11) 收录于米原万里《忽悠段子和黄段子》(文艺春秋社2000年版)第96—103页。
- 12) 小松达也《口译的英语、日语》，第40页。

- 13) 同上, 第 39—40 页。
- 14) 米原万里《忽悠段子和黄段子》, 第 96 页。英国人在日本国会演说的这一首例, 时间查为 5 月 12 日。
- 15) 施燕华《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28 页。
- 16) 二月河《雍正皇帝》下(第 3)部《恨水东逝》,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526—527 页。
头一句古蒙语原话最后加问号疑是笔误或排错, 本文按以句号结尾的其脚注汉译加以统一。
- 17) 同上, 第 594 页。本回标题后半部分《勤躬倦忧时托政务》按目录, 第 580 页起首处大字印的标题及本部分双数页上方小字印的标题中, “忧”莫名其妙地成了“优”。
- 18) 张杰《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与影响》, [哈尔滨]《北方文物》季刊 1995 年第 1 期。
- 19) 同上。
- 20) 参见《满语, 丢失的历史密码》(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官方网站 2012 年 1 月 16 日转自 [广州]《羊城晚报》, 文末注明“原载《看历史》李扬”。作者及原出处待核实)。
- 21) 李海鹏《满语消失的最后一瞬》, [广州]《南方周末》2007 年 7 月 25 日。
- 22) 原非、张庆编著《毛泽东入主中南海前后》,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48 页。
- 23)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第 231 页。
- 24) 参见 [东京]平凡社编辑、刊行《世界大百科事典》改订新版(共 30 卷 [另有《索引》、《世界地图》、《日本地图》各 1 卷], 2007 年)《阿伊努》条目。
- 25) 木户纯生《北海道二风谷 在阿伊努人聚居处体验生活⑥ 濒于灭绝的阿伊努语 为传给后代而学》, 《日本经济新闻》2013 年 5 月 18 日晚刊。
- 26)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防教育办公室发言《紧贴形势任务和民族地区实际 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全国国防教育工作会议”网 2009 年 11 月 11 日发布。
- 27) 宁夏数据来源同上; 新疆数据为 2000 年大陆人口普查结果(59.43%), 其时宁夏为 34.56%。
- 28)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列宁全集》刊行委员会译《列宁全集》第 31 卷, [东京]大月书店 1959 年版, 第 30 页。该译文后半部分原作“もっともおそろべき力である”, 也许是考虑到当时已有的日本读者对多用汉字感到厌烦的倾向, 在此为了利于汉语读者及显示两国语言的相通, 改为“最も”(最)、“恐るべき”。下文内的《共產主義に於ける“左翼”小兒病》, 特用汉字的“於”(于)日语也多作“お”。

(夏 刚, 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日中間及び兩国内部の言語の相関・相違と相生・相克の位相・諸相（1）

シリーズ論文の第1部分と成る本稿では、表題の多角的な研究の導入部として、先ず「バベルの塔」の伝説が象徴する様な言語の壁を中国の内部から見付け出す。清朝の支配者・満族の言語が次第に漢族の言語に同化させられた変遷や、主体民族の使用に困って国語の地位を保ち続けて来た漢語（中国語）の強靱さを分析する。更に、日本に於ける日本語の絶対的な優位と比較しつつ、55の少数民族を抱える老大国の中の漢語の在り方を論じる。

『広辞苑』『日本国語大辞典』と『現代漢語詞典』『辞海』『漢語大詞典』の語釈・用例等の照合を通して、漢語語彙を中心に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共通点・相違点を究明し、中国語に対する日本語の意欲的な受容や自主的な改造の様態から、不即不離の均衡感覚を読み取り、類型や原理の抽出を試みる。

（夏 剛，立命館大学国際関係学部教授）

